

## 跨越歐亞戰爭語境的左翼國際主義： 論巴比塞《火線》及葉靈鳳的中文翻譯\*

鄭可怡<sup>†</sup>

### 一、引言

二十世紀全球左翼文藝思潮迅速發展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因應國內發生的政治革命、新文化運動與革命文學，積極引介國外的左翼文藝。循着「竊火」（魯迅語）和「救荒」（胡適語）兩種途徑，<sup>1</sup>不僅俄蘇的革命文學和革命文藝理論大量逐譯成中文，國際親蘇的左翼作家亦同樣受到青睞，包括著名的法國左翼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二十年代，巴比塞以法國現代「非戰派」最有名的小說家（文學）<sup>2</sup>、社會革命思想家（政治）<sup>3</sup>和一次大戰戰士（軍事）<sup>4</sup>的身分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相較

---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RGC General Research Fund）資助計劃研究成果之一（計劃編號14610515）。部份章節初稿曾提交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文化交流與觀照想像：中國文哲研究的多元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12月8–9日）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主辦華文與比較文學協會（ACCL）雙年會「文本、媒介與跨文化協商」（2017年6月21–23日）。

† 鄭可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sup>1</sup> 見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頁84；胡適：〈致曾樸〉（1928年2月21日），載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上冊，頁412。

<sup>2</sup> 參考沈雁冰、鄭振鐸：〈現代世界文學者略傳（二）〉，《小說月報》第15卷第2期（1924年2月），頁3–5；巴比塞（著）、劉延陵（譯）：〈不吉的小月亮〉（附作者簡介），《小說月報》第14卷第3期（1923年3月），頁7。

<sup>3</sup> 參考巴比塞（著）、雁冰（譯）：〈巴比塞的小說〈名譽十字架〉〉（附作者思想簡介），《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3期（1920年7月1日），頁60–64；沈起予：〈H. Barbusse 之思想及其文藝〉，《創造月刊》第2卷第6期（1929年1月10日），頁201–5。

<sup>4</sup> 參考羅曼·羅蘭（著）、張崧年（譯）：〈精神獨立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1日），頁36–37，注釋三：Henri Barbusse。

於同期譯介至中國的兩位法國非戰派作家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和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1866–1944)，巴比塞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具有獨特見解，因而備受關注。縱使不少中國左翼作家認為巴比塞並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甚或指其作品「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sup>5</sup>但他秉持法語左翼相對開放的異質性觀點，為當時中國不同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反思的方向。<sup>6</sup>

三十年代中國本土語境和東亞政局發生急劇變化——「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奪取中國東北三省，侵華戰爭全面展開，早已飽受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困擾的中國知識分子遂積極投身反戰文學的創作和翻譯，<sup>7</sup>從中思考戰爭的出路。當時國際左翼陣線堅持反戰立場，歐洲左翼作家的反戰著作遂再次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巴比塞利用自身參與一次大戰經驗撰寫的小說《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 1916) 更成為代表著作。過往中國學者並非完全忽略巴比塞非戰論述的複雜性，但在戰火陰霾之下，他們偏重於作家兩種相關又相悖的面向：其一，巴比塞既是「非戰派」作家，又具有國際左翼陣線「反戰」戰士的身分。在現實的

<sup>5</sup> 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並 J. K. 來信）〉，載魯迅：《二心集》，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卷，頁395。魯迅以外，沈起予同樣認為巴比塞並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議論，雖比較進步，但他並不是一個戰鬥的唯物論者。」見沈起予：〈H. Barbusse 之思想及其文藝〉，頁210。

<sup>6</sup> 二十年代初，巴比塞的政治觀點受到不同政治立場的中國知識分子所關注。當時同屬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沈雁冰為《小說月報》撰寫「海外文壇消息」，引述巴比塞〈社會主義者之天職〉一文指出，在達致社會主義的目標上，他同意軍事革命、政黨專政作為手段的觀點：「社會主義者不應顧慮不敢近極端派，……如果我們欲撲滅階級，就一定得先有個第四階級的專政時代，……世界革命是必不可緩的了。」一次大戰後，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的論爭，則受到反對社會主義、馬列主義而支持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創黨成員李璜（1895–1991）所關注，並摘要翻譯1921–1922年間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筆戰的四封公開書信。此外，沈起予討論巴比塞的文藝和思想，特別分析他在此場論爭中有別於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見鄭振鐸、沈雁冰：〈巴比塞的社會主義譚〉，《小說月報》第12卷第3號（1921年3月），頁4；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少年中國》第3卷第10期（1922年5月），頁25–36；沈起予：〈H. Barbusse 之思想及其文藝〉，頁203–12。有關巴比塞與三十年代法國、比利時等地法語左翼知識分子有別於蘇共中央的無產階級文藝觀點，參考鄭可怡：《黑暗的明燈：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37–48。

<sup>7</sup> 李今：《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三四十年代·俄蘇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12–19。羅執廷指出，三四十年代國人普遍有「反帝」、「反戰」的意識，除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外因，以及中國本身長年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的內因，都刺激了人民的反戰情緒，中共鼓吹「反內戰」以抵抗國民黨以及陳獨秀等「托派」追隨者有關「反戰」和「和平統一」的政治主張，亦帶來部份的影響。見羅執廷：〈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與民國時期的非戰／尚戰話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0期，頁140–47。

政治行動方面，巴比塞一直參與反戰爭、反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運動，三十年代更與國際左翼知識分子一起對抗法西斯極權暴行的拓張。<sup>8</sup>1933年，巴比塞與羅曼·羅蘭計劃率領「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代表團來華調查日本侵華情況。他們努力介入中國的現實政治，縱使最終未能成行，還是受到魯迅等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sup>9</sup>因此，當1935年巴比塞在訪蘇期間猝然逝世，就引來了國內報章雜誌的廣泛報導。其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全面侵略的危機，巴比塞的創作及言論被大量引用並改造成為鼓勵中國青年作家奮勇抗戰最有力的政治宣傳。作為歐洲反戰小說的代表作，《火線》被中國知識分子刻意解讀成為抗戰的直接「號召」。從「反戰」到「抗戰」的小說解讀，巴比塞「以戰抗戰」的姿態在亞洲的戰爭語境得到了多重面向的呈現。

基於上述的政治背景，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現代派作家葉靈鳳（1905–1975）<sup>10</sup>選譯巴比塞的《火線》，便顯得尤為重要。二十年代，正值中國知識分子回顧歐洲一次大戰爆發十週年，《火線》部份章節首次譯介至中國。<sup>11</sup>及至三十年代「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小說在戰爭語境再被三度翻譯。不過兩位譯者莫岡和婁放飛

<sup>8</sup> 三十年代初由於法西斯在歐洲的威脅日益嚴重，巴比塞和羅曼·羅蘭致力聯合世界各地不同組織的力量進行反戰、反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的運動。1932年5月27日，他們首先在《人道報》發表文章號召舉行反戰大會，同年8月27至28日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世界反帝國主義戰爭會議（Congrès mondial de lutte contre la guerre impérialiste）。1933年6月巴黎成立世界反法西斯及反戰同盟（Comité mondial de lutte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由巴比塞擔任主席。翌年5月20日再在巴黎召開會議，最終聯結了接近三千五百名來自不同政治組織的代表。參考 Jocelyne Prézeau, “Syndicats et organisations de masse. Le cas d’Amsterdam-Pleyel (1932–1934),” in Danièle Tartakowsky et Françoise Tétard, dir., *Syndicats et Associations: Concurrence ou complémentarité?*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6), pp. 391–98。

<sup>9</sup> 雖然巴比塞最終未能親自率領世界反帝國主義同盟的代表團訪華，但在1933年9月30日上海還是秘密舉行了國際反戰會議。參考〈社中日記〉，《現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頁885；露珠（譯）：〈國際作家總聯盟為反戰給全世界作家的信〉，《文學雜誌》第1卷第3、4期合刊（1933年7月），頁110–11；魯迅、茅盾、田漢：〈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團的宣言〉，《長風》第1卷第2期（1933年9月26日），頁60–61（轉錄自《反戰新聞》）；魯迅：〈新秋雜識〉，載魯迅：《准風月談》，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卷，頁286–88；魯迅：〈致蕭軍、蕭紅〉，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3卷，頁278–81。

<sup>10</sup> 中國「現代派」的說法早見於三十年代，傅東華從作家的共同審美趣味以及發表園地兩方面，提出「現代派」的形成，主要作家包括施蛰存、穆時英、葉靈鳳、戴望舒和杜衡。見傅東華：〈十年來的中國文藝〉，載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 1927–1937》第一集《文學理論集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87–88。

<sup>11</sup> 巴比塞（著）、李青崖（譯）：〈廊門（Le Portique）〉，《小說月報》第15卷第8期（1924年8月），頁1–18；巴比塞（著）、李青崖、羅黑芷（合譯）：〈砲戰（Bombardement）〉，《小說月報》第16卷第7期（1925年7月），頁1–16。

僅僅譯介小說的首二章，<sup>12</sup>只有葉靈鳳在中日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展以後計劃翻譯《火線》全書。<sup>13</sup>可是歷來有關葉靈鳳的文學研究，多偏重他1938年以前上海時期的小說創作。中日戰爭爆發後葉靈鳳離滬去港，雖然停寫小說，但翻譯不斷，只是論者大多關注他來港後發表香港歷史、地理風物的散文隨筆。再者，由於葉靈鳳的政治傾向複雜以及淪陷期間的「附逆問題」，討論他的文學翻譯和他左翼思想的關係，更是鳳毛麟角。

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時期（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又稱日佔時期）發表親日言論，又在日人管制的出版機構工作，因此被指為文化漢奸。近年史料文獻逐步開放，學者重新檢視有關說法：從1981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一則指葉靈鳳為「漢奸文人」舊注的刪改，推斷中共中央改變了過往對葉氏的政治判斷；<sup>14</sup>考掘四十年代國民黨和日軍的機密檔案，從香港日佔時期日軍成立的香港憲兵隊所留下的《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文件，揭示葉靈鳳是國民黨的

<sup>12</sup> 巴比塞(著)、莫岡(譯):〈火線下〉(第一章幻覺),《新地月刊》第4-5期(1932年7月),頁197-202; Henri Barbusse(著)、婁放飛(譯):〈火線下:或分隊士兵日記〉,《中華月報》第1卷第4期(1933年6月),頁C1-C2; Henri Barbusse(著)、婁放飛(譯):〈火線下(續)〉,《中華月報》第1卷第5期(1933年7月),頁C5-C8。1936年,鄭振鐸在《世界文庫第二年革新計劃》中預告出版婁放飛翻譯的《火線下》全書,並附小說內容簡介,可惜該書最終未能出版。見〈火線下〉,《世界文庫第二年革新計劃》(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13。

<sup>13</sup> 1940年初葉靈鳳首次發表《火線》翻譯的章節,在譯者前言表示「全書已翻譯將竣」。兩年後他發表文章提及此事,則表示在香港淪陷(1941年12月15日)以前花了一年時間完成《火線》「半部小說」的翻譯,可惜一次日軍搜查,鄰居怕他受牽連,替他燒燬了小說翻譯原稿。由此推斷,葉靈鳳很可能在1939年間翻譯《火線》全書。可惜由於戰火蹂躪,葉靈鳳的小說翻譯最終只有五章在1940年發表。見靈鳳:〈巴比塞的《火線下》〉,《立報·言林》,1940年2月22日;葉靈鳳:〈吞旂隨筆〉,《新東亞》創刊號(1942年8月);收入絲韋(編):《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27-29;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一至一〇六),《立報·言林》,1940年2月22日至6月17日。又1958年中國才出版《火線》全文翻譯,見巴比塞(著)、一沙(譯):《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sup>14</sup>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魯迅全集·三間集》所收〈文壇的掌故〉一文有關《戈壁》雜誌的注解,特別提及葉靈鳳「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將有關葉靈鳳的注文改入〈革命的咖啡店〉一文中,同時刪去「投機」、「轉向」、「漢奸」等字眼。參考魯迅:〈文壇的掌故〉,載魯迅:《三間集》,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4卷,頁96、509(注6);魯迅:〈革命的咖啡店〉,載《三間集》,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卷,頁118(注5);絲韋(羅孚):〈葉靈鳳的後半生〉,載《葉靈鳳卷》,頁347。

特別情報員；<sup>15</sup>又從1942年1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呈交行政院之《香港近狀報告書》，得知「葉同志為本處〔即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派港宣傳指導員」的身分，指他表面參與日本大同圖書印務局在港的編務，實質暗中為重慶搜集情報。<sup>16</sup>

再有知情者撰文，力證葉靈鳳從事抗日的情報工作，<sup>17</sup>甚至指出香港淪陷時葉氏沒跟隨其他文化人離港，乃受長期擔任中共中央情報領導的潘漢年（1906–1977）指示，負有特殊任務留港。<sup>18</sup>不過正如論者所言，葉靈鳳的附逆問題緊扣着後來潘漢年

<sup>15</sup> 姬田光義編：《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1990年第二刷），頁100–102、226–27、314。

<sup>16</sup>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閩粵區宣傳專員辦事處送呈《香港近狀報告書》，1942年11月，頁53（藏香港歷史檔案館，參考編號：HKMS 175-1-49）。鄭明仁參考此檔案撰文詳述有關問題，見鄭明仁：〈香港淪陷時期的葉靈鳳〉，《城市文藝》總第80期（2015年12月），頁17。

<sup>17</sup> 香港金融家胡漢輝憶述四十年代他和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同學陳在韶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形，其中提及葉靈鳳從事抗日的情報工作：「陳在韶曾經潛回香港，據云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往廣洲灣活動，負責搜集日軍情報，……陳要求我配合文藝作家葉靈鳳先生做點敵後工作。靈鳳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屬大岡〔應為「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我負責轉運。」事實上，葉靈鳳在1946年5月3日的日記也記載：「開始計畫寫『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記所參加的秘密工作及當時殉難諸同志獄中生活及死事經過。」見胡漢輝：〈四十年後話「中新」〉，載廣州、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籌備會（編輯）：《歷史·話舊·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頁54–55。關於葉靈鳳日記手稿的整理，參考羅孚：〈葉靈鳳的日記〉，《書城》第24期（2008年5月），頁53。隨着更多知情者發表回憶文章，葉靈鳳在「附逆問題」上漸漸得到較清晰和公允的說明。另參考絲韋（羅孚）：〈葉靈鳳的後半生〉，載《葉靈鳳卷》，頁346–52；柳蘇（羅孚）：〈鳳兮鳳兮葉靈鳳〉，《讀書》1988年第6期，頁22–28；羅孚：〈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載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頁308–18；趙克臻：〈趙克臻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羅孚信件〉（附：〈編者說明 葉靈鳳的「附逆問題」〉），載《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319–25；鄭明仁：〈香港淪陷時期的葉靈鳳〉，頁16–21。

<sup>18</sup> 姜德明引述中共地下黨成員夏衍的文章，說夏衍在1945年10月24日的《建國日報·春風》以編者的名義為葉靈鳳申辯：「葉靈鳳先生也是香港文協分會理事，他也是當時香港反對汪逆『和運』的健將，香港淪陷後，本報同人之一曾和葉氏在防空洞中相遇，約其同行離港，葉答以有事不能遽離。」多年後姜德明再致函夏衍問及此事，夏衍1988年8月12日回覆：「在防空洞裡遇到他的是我，他說『有事』，則是1939年潘漢年交給他的『事』，後來（解放前的47、48年）潘說過：要他（指葉）保持超然的態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將來『為我們幫忙』。」見姜德明：〈夏衍為戴望舒、葉靈鳳申辯〉，《文藝報·副刊》，1988年9月24日，第8版。

被指「內奸」的複雜案件，<sup>19</sup>二人關係在「潘案以前不該說，案後更不能說」。<sup>20</sup>是以葉氏的附逆問題無從解決，他與左翼文藝以至中共的關係甚至成為研究上的盲點。<sup>21</sup>

縱然文學研究無法釐清葉靈鳳的政治問題，學者仍嘗試從強權高壓統治下的寫作、翻譯、互文等方面，剖析抗日戰爭時期知識分子「內在抵抗」的不同策略，例如葉靈鳳在淪陷期間，藉宋末元初詩人兼畫家鄭所南在亡國後畫蘭皆露根不著土的故事，諷諭土地為外人所奪（「一片中國地，為番人所得，吾忍畫耶？」），回應當時香港的處境。<sup>22</sup>香港文學研究者盧瑋鑾也表明，葉靈鳳在日本宣傳大東亞共榮的刊物《新東亞》月刊創刊號上，發表〈吞旂隨筆〉為題的文章，借古喻今，利用西漢蘇武「吞旂」持節不屈的典故，窺避日軍審查，向中國讀者傳遞抗日訊息。<sup>23</sup>1944年崇禎皇帝殉國三百週年，葉靈鳳撰文〈吞旂讀史室簡記〉，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熱心

<sup>19</sup> 1955年，毛澤東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指他在抗戰期間私下與汪精衛會面而沒向中共報告，並協助日本、中共雙方交流情報以對抗國民黨，1963年以「內奸」、「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1976年改判無期徒刑。六十年代負責審理此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助理審判員彭樹華，在四十多年後公開憶述了潘漢年案審訊「誤判」的經過，以為潘漢年當時是在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的同意下與汪精衛和日軍洽談，潘氏死後五年（1982年）得到平反。參考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頁24-26；彭樹華：《潘漢年案判審前後：審判員親筆批露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盧瑋鑾、鄭樹森、熊志琴：〈淪陷時期香港文學及資料三人談〉，載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7年），頁11-14。

<sup>20</sup> 姜德明引述夏衍的話，見姜德明：〈夏衍為戴望舒、葉靈鳳申辯〉。

<sup>21</sup> 葉靈鳳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糾結關係並不始於抗戰時期。1931年，「左聯」指葉靈鳳「向國民黨寫（悔過書）」，並且實際的為國民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奔跑，將他開除。曾與葉氏在上海現代書局共事的現代派作家施蟄存說：「其實他和國民黨沒有組織關係，不過自以為消息靈通，在兩邊說話，失於檢點。但他畢竟沒有出賣或陷害革命同志。潘漢年每次化裝來滬，總是到編輯部來找他，也許他還為潘漢年做過一些事。」見施蟄存：〈我和現代書局〉，載《施蟄存文集》文學創作編第二卷《北山散文集（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26；梁永（鍾朋）：〈葉靈鳳的前半生〉，載《葉靈鳳卷》，頁339-41。

<sup>22</sup> 羅孚：〈葉靈鳳的日記〉，頁53。從葉靈鳳1943年9月的日記，可知他早有計劃撰寫鄭所南畫蘭的故事，最終於1945年3月18日發表了文章〈記鄭所南〉。見葉靈鳳：〈記鄭所南〉，《華僑日報·文藝週刊》，1945年3月18日；收入《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259-62。

<sup>23</sup> 參考葉靈鳳：〈吞旂隨筆〉，頁29；盧瑋鑾：〈附錄：《吞旂隨筆》是「物證」之一〉，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37-38。論者亦曾詳細分析香港淪陷以前葉靈鳳在《華僑日報》副刊《文藝週刊》發文，借助中外歷史及文學典故曲筆抒發家國情懷，詳見張詠梅：〈「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談《華僑日報·文藝週刊》（1944.01.30-1945.12.25）葉靈鳳的作品〉，《作家》總第37期（2005年7月），頁17-22。

研究明末情勢的原由，指稱當「言網又很嚴密，一切言論均不得自由」，便只能利用歷史諷刺時局，頗有弦外之音。<sup>24</sup>

本文以「南來文人」葉靈鳳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香港淪陷以前在港的翻譯和編輯活動，考察他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迫、英國殖民政府的政治審查以及親日的「和平文藝」運動等多重政治話語交疊的情況下，如何利用西方文學資源發展「內在抵抗」的策略。葉靈鳳〈吞旂隨筆〉一文分三個小題循不同路徑曲折回應中日戰事，當中「火線下的《火線下》」一則便刻意提及戰爭中他痛失淪陷以前「花了一年心血才譯了一半」的小說翻譯原稿——即巴比塞的《火線》。葉氏犯險選擇在日軍掌控的雜誌發文，重提自己曾翻譯這部一戰時期歐洲著名的反戰著作，藉此宣示其反戰以至左翼思想。1940年，葉靈鳳在自己主編的《立報》副刊〈言林〉連載巴比塞《火線》最後五章的翻譯，<sup>25</sup>他以為當時「旁的書僅是描寫戰爭的型態，『火線下』卻寫了『戰爭』本身」，小說「指示今後如何避免這慘殺的途徑」。<sup>26</sup>由此，《火線》所牽涉各種複雜的戰爭思考和意識型態，隨着中文翻譯跨越一戰和二戰的時間維度，進入抗日戰爭的歷史脈絡。從跨越歐亞戰爭語境的角度而言，小說有關戰爭本質、左翼國際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議題，必須重置於歐亞兩洲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加以探討。從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關係研究的角度而言，葉靈鳳的選譯及評論也提供了特殊案例，讓讀者得以窺探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現代派作家政治意識型態的複雜性。本文將探討以下問題：第一，巴比塞的《火線》作為一次大戰的反戰文學，如何在軍國主義及和平主義的雙重否定之中發展其獨特的革命思路？第二，在跨越歐亞戰爭語境之下，巴比塞和葉靈鳳有關戰爭、國際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思考在各自的時代面對怎樣不同的衝擊？第三，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面對英國殖民政府嚴苛的政治審查，如何通過文學翻譯突破受制的言論空間？葉靈鳳又如何重新詮釋《火線》以回應當下的政治環境？

<sup>24</sup> 靈鳳（葉靈鳳）：〈吞旂讀史室筭記〉，《大眾週報》第3卷第2號54期增刊〈南方文叢〉（1944年4月8日），頁1。

<sup>25</sup> 《立報》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創刊，1937年11月22日南京、上海相繼淪陷後宣告停刊；1938年4月1日在香港復刊，至1941年12月因香港淪陷而關閉。《立報》有三個副刊：〈小茶館〉、〈言林〉、〈花果山〉。〈言林〉屬新文藝版頁，香港復刊後由茅盾主編，自1939年1月7日起交由葉靈鳳主編，直至1941年6月11日。有關《立報》在上海和香港的發展，可參考李時新：《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3-26；薩空了：〈我與《立報》〉，《新聞研究資料》1984年第3期，頁1-7；1984年第21期，頁55-73；1984年第22期，頁62-78；1985年第1期，頁28-38；1985年第2期，頁28-38。〈言林〉主編的人事交替情況，可參考葉靈鳳：〈編者啟示〉，《立報·言林》，1939年1月7日；大哀：〈也算聲明〉，《立報·言林》，1941年6月11日；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41、44、51-55（書中轉引了1938年4月1日《立報·言林》復刊號所載茅盾的〈言林獻詞〉，此日報章未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收藏）。

<sup>26</sup> 靈鳳：〈巴比塞的《火線下》〉。

## 二、以戰抗戰：一次大戰時期《火線》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1914年8月9日，巴比塞赴前線以前，致函《人道報》(*L'Humanité*)的主編饒勒斯(Jean Jaurès, 1859–1914)，<sup>27</sup>就自己的政治立場作出如此吊詭的表述：他既是「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又是積極參與戰爭的「戰士」。青年時期的巴比塞，曾跟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學英語，又隨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學哲學。在父親的熏陶下，巴比塞以詩人的身分踏足文壇，後來因為戰爭的緣故，介入了政治現實。<sup>28</sup>歐洲一次大戰爆發，年過四十的巴比塞自願參軍，主動向饒勒斯表達自己的立場和志向：「您是否願意將我視為自願參與當下戰爭的反戰社會主義者？我要求並獲得分派到軍隊中負責輔助工作，幾天之內我將起行成為普通步兵。〔這場戰爭〕乃針對我們那永恆而可恥的敵人：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軍刀、長靴以及我要補充的：冠冕。」<sup>29</sup>

1915年6月25日，巴比塞在戰壕中給妻子寫信，反覆提及自己參戰的頑強信念：「我在這裡的工作是可怖的，每天的場景更是我們從前無法想像的可怕。但這戰爭是一場思想和自由之戰，我參與其中正因為它將要擊敗我們的宿敵——軍國主義。」<sup>30</sup>巴比塞自視為「反戰的社會主義者」(*le socialiste antimilitariste*)，卻積極參戰。

<sup>27</sup> 《人道報》是法國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前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的機關刊物。

<sup>28</sup> 巴比塞在中學時期便開始在《盛宴》(*Le Banquet*)以及由法國著名詩人曼德斯(Catulle Mendès, 1841–1909)主編的《巴黎回響》(*L'Echo de Paris*)等文藝評論刊物上發表作品，更多次獲得《巴黎回響》授予詩歌及散文創作獎。1895年巴比塞二十二歲，出版詩集《泣婦》(*Pleureuses*)。見 Henri Barbusse, “Adieu” (poésie de prix), *L'Echo de Paris* (supplément littéraire illustré), Le 13 novembre, 1892, p. 2; Henri Barbusse, “Evocation,” *Le Banquet* 8 (mars 1883), p. 242; Henri Barbusse, *Pleureuses* (Paris: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1895)。

<sup>29</sup> Henri Barbusse, “Lettre au Directeur *L'Humanité*” (Le 9 août, 1914), in idem, *Paroles d'un combattant: articles et discours (1917–1920)* (Paris: Ernest Flammarion Editeur, 1920), pp. 7–8: “Voulez-vous me compter parmi les socialistes antimilitaristes qui s'engagent volontairement pour la présente guerre? Appartenant au service auxiliaire, j'ai demandé et obtenu d'être versé dans le service armé et je pars dans quelques jours comme simple soldat d'infanterie. [Cette guerre] est dirigée contre nos ennemis infâmes de toujours: le militarisme et l'impérialisme, le sabre, la botte, et j'ajouterais: la Couronne.”

<sup>30</sup> 此信並沒收入一次大戰期間巴比塞致妻子書信的結集 *Lettres de Henri Barbusse à sa femme, 1914–1917* (Paris: Ernest Flammarion Editeur, 1937)，只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巴比塞資料庫。轉引自 Philippe Baudorpe, “Que nous dit *Le feu* d'Henri Barbusse?,” in Annamaria Lasserre, Nicole Leclercq, and Marc Quaghebeur (dir.), *Mémoires et Antimémoires littéraires au XXe siècl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Bruxelles: P.I.E. Peter Lang, 2008), vol. 1, pp. 154–55: “Le métier que je fais ici est en effet terrible et le spectacle journalier plus épouvantable

〔下轉頁163〕

儘管他對參軍的信念堅定不移，但論思想和行動的複雜縝密，他遠過同代的左翼知識分子，因而令人難以理解。一方面，他堅決反對國際間由軍國主義 (le militarisme) 和帝國主義 (l'impérialisme) 所引起的戰爭，但拒絕高舉「義戰」的旗幟鼓勵法國兵士參戰。另一方面，他堅決「反戰」，卻沒有加入和平主義者的行列，甚至親赴戰場主張以「另一種戰爭」消滅戰爭。因此，他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表的《火線》，遂成為探討作家本人以至戰時歐洲知識分子各種意識型態及對戰爭思考的重要中介。

### (一) 軍國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雙重否定

根據巴比塞隨行筆記的記載，他1914年8月1日抵達法國北部前線，留守接近二十二個月，期間參與多場激烈戰事，最後因傷被迫離開戰場。<sup>31</sup>他利用參軍的親身經歷及對戰事日記式的紀錄，在戰壕和醫院裡寫成《火線》。小說自1916年8月開始在社會主義日報《工作》(L'Œuvre) 的文學欄以連載的形式 (en feuilleton) 發表，<sup>32</sup>其後結集成書並獲該年度的龔古爾文學獎 (Prix Goncourt)。《火線》題辭說明以此書「紀念在克魯伊和一一九號高地我身旁倒下去的戰友們」(À la mémoire des camarades tombés à côté de moi à Crouy et sur la côté 119)，當中提及的兩個地點正是作家在1915年1月和9月分別參與法國北部城鎮克魯伊 (Crouy) 和蘇謝 (Souchez) 附近一一九號高地的兩場戰役。這部共分二十四章的小說，不只是文學作品，還是戰爭的文獻資料和見證紀錄，記述法軍裡一個全由社會底下階層(礦工、佃農、船夫、車夫、店員等)組成的步兵分隊，在戰壕中遭遇的痛苦經驗及對戰爭的議論和反思。

二十年代《火線》已被追溯為法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先聲，<sup>33</sup>但對巴比塞而言，真正能肯定這部作品的文學和思想價值的，只有小說的描寫對象——戰場上的兵士。1917年，《火線》發行特別版，巴比塞特意撰寫序言〈給倖存的兵士〉(Aux soldats

[上接頁162]

encore qu'on ne pourrait l'imaginer. Mais cette guerre est une guerre d'idées et de libération et j'y ai pris part parce qu'elle aboutira à la défaite de notre vieil ennemi, le militarisme." (Le 25 juin, 1915)

<sup>31</sup> Henri Barbusse, "Le Carnet des notes" et Lettres du 23 au 27, Septembre, 1915, in *Lettres de Henri Barbusse à sa femme, 1914-1917*, pp. vi-xii, 170-78.

<sup>32</sup> 小說從1916年8月3日至11月9日於泰里 (Gustave Téry, 1870-1928) 主編的社會主義日報《工作》(L'Œuvre) 分九十三期連載，原題《火線：一個抗爭者的紀錄》(Le Feu. Note d'un combattant)，結集成書後改題《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

<sup>33</sup> 例如法國無產階級文學作家普拉耶 (Henri Poulaille, 1896-1980)，他不僅視《火線》為法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先導，更將《火線》與雷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 的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9) 比較討論。見 Henri Poulaille, "Le feu, à propos du livre de Remarque," *Monde*, Le 20 juillet, 1929, p. 4。

vivants) , 直言小說之所以得到曾經戰火的兵士們喜愛，是「因為它說出了真理」：「在〔裡〕面你們看見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在〔裡〕面你們看見了大戰的面貌，正如你們經歷的一樣。」<sup>34</sup> 作者讚揚前線兵士，突出他們對戰爭本質的理解以及對真理的探尋：

我是深知你們的人，同時深知你們配擁護真理。……你們是高尚的，我們不要向世界隱瞞任何你們曾經忍受的苦難。讓那些態度模稜的新聞記者說你們受騙，說你們是被甜言密語所欺而盲從別人的吧；讓後方那矯言偽行的讀者當知道什麼人適於以拯救正義的理想時，蒙住他們的臉孔塞閉他們的耳鼓吧；讓詭辯的學者們竄改，偽造，歪曲，降低人在戰爭中是唯一見證者和唯一裁判者這真理吧。這有什麼關係？真理，這是真理呵！至於其他的一切，沒有比下面一句話更光榮的讚詞可以給予你們：這就是他們所酷似！我了解你們，同樣地了解只有真理是配你們去追求的！<sup>35</sup>

《火線》這部戰爭文學作品，出版四年，印數高達三十萬冊，隨即翻譯成為十二種語言，也受到法國文藝界的重視。<sup>36</sup> 從法蘭西學院 (L'Académie française) 與龔古爾學院 (L'Académie Goncourt) 在戰時仍勉力維持頒授兩項具代表性的文學獎，可知戰爭與文學的關係是當時法國以至整個歐洲新舊作家極力探討的寫作題材，他們對於戰爭的思想取向、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想像，以至文學作為政治宣傳介入社會等議題，都必須通過作品直接回應。有別於同期發表的戰爭文學，《火線》從兩方面展示出絕然不同的政治姿態。

<sup>34</sup> 巴比塞 (著)、茹雯 (譯)：〈戰鬥者言 給生存的兵士——「火線下」特版序，一九一七·九月〉，《野草》1941年第5期，頁2；Henri Barbusse, “Aux soldats vivants” (Préface d’une édition spéciale du *Feu*, septembre 1917), repris in *Paroles d’un combattant: articles et discours (1917–1920)*, p. 44。

<sup>35</sup> 巴比塞 (著)、茹雯 (譯)：〈戰鬥者言 給生存的兵士〉，頁2–3；Barbusse, “Aux soldats vivants,” p. 44: “Moi qui vous connaissais, je savais que vous étiez dignes de la vérité. Vous êtes dignes qu’on ne cache au monde aucune des douleurs que vous avez supportées. Que des journalistes équivoques aient osé écrire qu’il faut qu’on vous trompe et qu’on vous mente pour mieux vous mener; que tels lecteurs de l’arrière se voilent la face pudiquement et se bouchent les oreilles lorsqu’on leur révèle tout ce que l’homme est capable de subir pour sauver l’idée de justice; que tels sophistes, apprêtent, falsifient, escamotent ou essayent de rapetisser une réalité depositaires et les seuls juges, qu’importe! Vérité, vérité! Au reste, il n’y a pas de plus lumineux éloge qu’on puisse faire de vous de dire: les voici tels qu’ils sont. Moi qui vous connaissais, je savais que seule la vérité était digne de vous.” 中譯「你們配從世上消滅一切你們自己的苦難」一句，為原文所無，據刪。

<sup>36</sup> Henri Hertz, *Henri Barbusse, son œuvre: étude critique, document po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 du Carnet-Critique, 1920), p. 61.

其一，自1914年歐戰爆發以來，《火線》已是連續第三部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戰爭小說，但它的反戰意識與前兩部高舉愛國主義的獲獎著作大相徑庭。1914獲獎的貝特朗《地之呼喚》(Adrien Bertrand, *L'Appel du sol*)<sup>37</sup>以及1915年獲獎的本雅明《加斯帕爾》(René Benjamin, *Gaspard*)，均從愛國主義的立場肯定法國軍隊參與戰事的崇高形象。再檢視跟《火線》同年出版、獲法蘭西學院讚譽並取得蒙第雍獎(Prix Montyon)的維尼斯—羅席《沃屈瓦的士兵布呂》(Jean des Vignes-Rouges, *Bourru, soldat de Vauquois*)，<sup>38</sup>二書亦同樣從愛國主義的立場記述戰爭，甚至頌揚兵士自我犧牲，成就正義之戰。相對而言，巴比塞以至唯一願意刊載其小說的報刊編輯泰里(Gustave Téry, 1870–1928)，均冒着法國國內各種政治審查的壓力，在國家軍隊全面投入戰事之際通過文學寫作宣揚反戰意識。<sup>39</sup>

這種表面看來與民族利益相抵觸的反戰主張，在一次大戰結束、政治氛圍改變以後，才得到重新審視。世界各地不少知識分子撰文回顧，認為偏狹的愛國主義才是促成戰爭的主要原因。雖然歐洲一次大戰並沒帶給中國沉重的戰爭記憶，相關的文學著作也要待戰爭結束以後才逐步譯介至中國，但如學者所指，一次大戰是通過報刊雜誌等新興傳播媒體，以「文本」論述建構的獨特形式在中國「重現」(representation)，在政治和文化層面深遠影響了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以至中國自身政治和文化發展的省思。<sup>40</sup> 二十年代中國文藝雜誌亦曾組織「歐戰文學專號」，<sup>41</sup> 其中茅盾(沈雁

<sup>37</sup> 因為戰爭關係，龔古爾學院延遲至1916年才宣佈伯特蘭《地之呼喚》獲1914年龔古爾文學獎，詳見 Marie-Aude Bonniel, “L'appel du sol d'Adrien Bertrand (1916),” consulté le 9 août, 2018. URL: <http://www.lefigaro.fr/histoire/centenaire-14-18/2014/09/08/26002-20140908ARTFIG00088--l-appel-du-sol-d-adrien-bertrand-1916.php>。

<sup>38</sup> “Lauréats de Prix Montyon,” consulté le 9 août, 2018. URL: <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prix-montyon>。

<sup>39</sup> 《工作》日報主編泰里的女兒西蒙·泰里(Simone Téry, 1897–1967)詳細憶述父親刊載《火線》之時，如何面對國家嚴酷的政治審查機制。見 Simone Téry, “How ‘Under Fire’ Was Published,” *The New Masses* (31 December 1935), p. 14。此文發表翌年即兩度譯為中文：Simone Téry(著)、王卓(譯)：〈火線下是怎樣出版的〉，《青年文化》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16日)，頁36–37；S. 忒里(著)、梅里(譯)：〈「火線下」是怎樣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7號(1936年9月10日)，頁474。

<sup>40</sup> 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對抗德、奧、匈同盟國的一次大戰，事實上除了英日聯軍對抗德軍的青島戰役(1914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迫使中國迂迴地參與戰事以外，整場戰爭並沒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傷亡。歐洲有關一次大戰的文學著作，要待戰爭結束以後才逐步譯介至中國。參考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年9月)，頁91–131；丘為君：〈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91–146。

<sup>41</sup> 不少中國文藝雜誌均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紀念專號，包括《東方雜誌》的「歐戰十年紀念號」(1924)和《小說月報》的「歐戰文學專號」(1924)。《小說月報》早在1922年第13卷已〔下轉頁166〕

冰，1896–1981)發表的〈歐洲大戰與文學——為歐戰十年紀念而作〉便批評秉持愛國主義的作家，「終不免幫助了本國的帝國主義，他們也是一樣的看不見這次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爭權奪利的私鬥」。<sup>42</sup>至於非戰文學背後所秉持的人道主義，及對戰事冷靜、理性的分析，則再次得到肯定。「在此次大戰的狂飆下，在發瘋的愛國主義的威脅下，有許多文學者驚惶失措，改變了常態。能夠獨立於愛國狂的羣眾中間而夷然不動，像《暴民》裏的司蒂芬摩耳〔Stephen More〕的，簡直只有不多幾個」。<sup>43</sup>茅盾將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在一次大戰爆發以前一個月發表的戲劇《暴民》(*The Mob*)視為政治預言，認為他「早已窺見近代民族間衝突的癥結，早已料到那潛伏於民眾心底的偏狹的愛國主義會做出怎樣瘋狂的可怖的事來」，<sup>44</sup>繼而贊成德、法、俄、英、美、奧等國的非戰文學。同樣是一次大戰期間法國非戰作家的代表，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因而再次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前文提及巴比塞《火線》中〈砲戰〉(Bombardement)和〈廊門〉(Le Portique)兩個篇章，即因此在1924至1925年間首次譯介至中國。

其二，縱使巴比塞自視為「反戰的社會主義者」，《火線》又因大量描寫戰爭的可怖場面而被歸入非戰小說的範疇，但巴比塞跟當時本着人道主義立場、反對戰事、宣揚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不盡相同。他固然反對軍國主義的侵略，但同時反對各國以和平主義或保家衛國的民族主義為號召發動戰事。他主張「以另一場戰爭」徹底消滅所有戰事，自己甚至積極投身一次大戰。「以戰抗戰」的姿態，最終引來評論家與讀者對巴比塞政治取向的不同詮釋。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歐洲學界檢視一次大戰期間巴比塞和《火線》所表現的複雜意識型態，結果出現了各種分歧的意見。鑑於小說外部的戰爭語境以及當時法國國家嚴密的政治審查機制，論者質疑在法國參戰之際《火線》仍得以出版，是否純粹的和平主義著作。<sup>45</sup>他們甚或從小說文本、作家書

〔上接頁165〕

刊載〈戰後文藝新潮〉系列文章，探討戰爭對同盟國文學的影響，第11期有〈歐戰給與匈牙利文學的影響〉，第12期有〈歐戰與意大利文學〉；1924年第15卷更發表連串評論，具代表性的文章有：李青崖的〈幾本談大戰的法國小說〉(第7期)、傅東華的〈非戰文學碎錦〉(第8期)、沈冰的〈歐洲大戰與文學——為歐戰十年紀念而作〉(第8期)，同時發表了多種戰爭文學的翻譯。沈雁冰論文四年後出版單行本，見沈雁冰：《歐洲大戰與文學》(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

<sup>42</sup> 沈雁冰：〈歐洲大戰與文學——為歐戰十年紀念而作〉，《小說月報》第15卷第8期(1924年8月)，頁3。另參考雁冰：〈歐戰十年紀念〉，《文學》第133期(1924年8月4日)，頁1。

<sup>43</sup> 沈雁冰：〈歐洲大戰與文學〉，頁1。

<sup>44</sup> 同上注。

<sup>45</sup> Eberhard Demm, "Barbusse et son Feu: La dernière cartouche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française," in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No. 197: *Image civiles de la France en guer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 pp. 43–51.

信及政論文章，分析巴比塞自相矛盾之處：小說雖然不乏反戰言論，但仍致力於民族團結，期求戰勝德國以取得和平。部份論者從而推斷，《火線》不過是配合法國政府進行的民族主義戰爭宣傳，甚至認為小說是民族社會主義的言論(un discours social-patriotard)，鼓吹社會主義者的民族同盟(des socialistes de l'Union nationale)。<sup>46</sup> 眾說紛紜，突顯作家如何利用小說的獨有形式，吸納各種矛盾衝突的思想；而巴比塞一再提及的「另一場戰爭」，更是直指無產階級革命。此等主張在日後巴比塞的思想發展上，皆佔有關鍵位置。

## (二) 敵人在家國之內：《火線》與德、法、俄的無產階級革命

《火線》作為反戰的文學著作，文學形式的選取決定了政治意識傳達的途徑。小說基本通過指涉真實作者的第一人稱「目擊者—敘事者」(witness-narrator)記述當下戰事，內部結構亦刻意突破傳統戰爭文學的範式。《火線》將戰爭不同場景的破碎片段重組成為戰爭全景，重點並不在於戰役本身的推演，而在於目擊者兼敘事者「我」對不同戰爭處境的直接評價。為了讓「我」對戰事有充份評論的機會，小說各章不斷轉換兵士經歷的情景，包括前線作戰、戰壕屯駐、後勤善別、救護所狀況、逃兵槍決、強迫勞役、飢餓和死別等等。小說第二十章的同名章節〈火線下〉(Le feu)，正是從「我」的角度，對戰爭殺戮提出直接批評，道出戰爭對於作為「普通人」的兵士所造成的殘酷壓迫：

他們並不是士兵，他們都是人(des hommes)。他們並非冒險家或勇士，也不是生來的劊子手，更不是屠夫或牲畜。他們都是穿上了軍裝也可以辦得出的〔耕作者〕和〔工人〕。他們都是被拔出來的普通人(des civils déracinés)。現在都準備好了。他們在等待死亡或是屠殺的信號；可是你仍可看得出，從那垂直的刺刀閃光之間，他們祇是一些尋常的人(ce sont simplement des hommes)。每一個都知道，他要用他的頭，他的胸，他的肚腹，他的全身，毫無掩蔽，隨著向前指著的槍尖，面向那炮彈，那堆集準備好了的炸彈，尤其是那準確的無可逃避的機關槍——面向著這時正沉默得可怕的一切——在他未走近他必須要殺掉的另一個兵士之前。……他們並不昏醉。無論在生理上或是精神上。他們乃是在全然清晰的意識中，在絕對健康和強壯的狀態下，這樣被集合起來。使自己又驅向那由於人類的瘋狂賦給全體人類的那一種瘋狂的任務。你可以從他們的沉默，他們的冷靜，從那不自然的統治著他們的沉靜假

<sup>46</sup> Horst F. Müller, "La vision du caporal Bertrand ou plaidoyer pour une lecture historique du Feu d'Henri Barbusse," *Cahier Henri Barbusse* 14 (1989), pp. 21–39; Danielle Bonnaud-Lamotte, "Le feu de Barbusse, un discours social-patriotard?," *Mots* 24 (1990), pp. 94–101; Demm, "Barbusse et son Feu," pp. 43–63.

面具之下，看出他們的思緒，恐懼和永訣。他們並非你們所想像的英雄，可是他們犧牲的偉大，決非不曾親眼見過他們的那些人所能理解。<sup>47</sup>

本屬勞動階層、軍服之下寂寂無聞、不辨身分的兵士，成為戰爭文學的主人公。在「我」的觀察和認知裡，兵士並不無知，而且深明自己的身分和處境：「軍事上的榮譽，軍隊，所謂士兵這東西，將人們變成頑固的犧牲者或卑鄙的野漢的，這一切都是可恥的。是的，可恥的。」<sup>48</sup> 正因為他們在「清晰的意識」中，在「絕對健康和強壯的狀態」之下，被迫負起「由於人類的瘋狂賦給全體人類的那一種瘋狂的任務」——戰事中的殺戮。巴比塞對前線兵士勇敢面對在肉體和精神層面都無法逃脫的處境，心懷敬意。

除了目擊者兼敘事者的直接批評，小說也藉着「我」與人物的大量對話，展示面對戰爭的不同思想傾向。有別於強調不同意識型態並行不悖的「複調小說」形式，《火線》表現的主導思想非常鮮明。承接上文討論第二十章，小說描述敘事者所屬的小隊，在一場瘋狂進擊過程中，步兵隊隊長貝特朗(Bertrand)與「我」和其他法國兵士之間的對話，展示戰場上兵士們在內心痛苦掙扎之中對和平的渴望：

「我真不管這些閑賬，祇要我們能夠回去」，另一個說：「我希望〔戰爭〕快點完結，祇希望這個」。

貝特朗向例是很少談天的，而且從不願談到自己。可是他說，「我手上已經幹掉了三個。我像瘋人一樣的衝擊著。哎，我們一旦到了這裡都像是野獸一樣了」！……

「在这一切之中，你要知道」，貝特朗接下去說，「只有一個人物高昇在這戰事之上，因了他的勇敢的力量，和美麗而散發著光輝——」

我諦聽著，面向他倚在一根手杖上，沉醉在這黃昏的靜默中，從平日說話這樣少的嘴唇中所發出的聲音。他用一種明朗的聲音喊著：

「李卜克利希」！（歐戰時的一位德國革命家——譯者）<sup>49</sup>

永絕戰爭只有一途，就是以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消滅特權階級，終止帝國主義者發動國際戰爭，確立人民之間平等友愛的關係。巴比塞「以另一種戰爭」消滅戰爭的主

<sup>47</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十八)，《立報·言林》，1940年3月11日；Henri Barbusse, *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 présenté par Denis Pernot (Paris: Flammarion, 2014), p. 323。葉靈鳳將耕作者(des laboureurs)誤譯為「勞工」，又將工人(des ouvriers)誤譯為「手藝人」，現據原文修訂。一沙的譯本(頁266)也做了相近的修訂。

<sup>48</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三十一)，《立報·言林》，1940年3月26日；Barbusse, *Le Feu*, p. 340。

<sup>49</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三十)、(三十一)，《立報·言林》，1940年3月25、26日；Barbusse, *Le Feu*, pp. 339-40。

張，在小說裡迂迴地透露了其思想來源。其一，從法國步兵隊隊長貝特朗的口裡，道出一次大戰困局的曙光——德國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領導李卜克內西 (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從 1916 年 10 月巴比塞給妻子的書信可見，他非常在意正在法國報刊連載的《火線》裡面，提及來自「敵國」的李卜克內西的段落，所引起編輯和讀者怎樣的反應。<sup>50</sup> 李卜克內西一直反對軍國主義，早於一次大戰爆發前的 1907 年，已發表《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 (*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揭示軍國主義如何與資本主義結盟發動國際戰爭，對外侵略和掠奪，並就無產階級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提出策略性的論斷。<sup>51</sup> 1912 年他撰寫文章〈和平從哪裡來？〉 (*D'où viendra la Paix?*)，號召法國的社會主義同盟進行國內的無產階級鬥爭：「內戰反抗內敵，群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階級鬥爭——外部和平，國際團結一致，人民之間的和平：這是解放國家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e) 的神聖口號。」<sup>52</sup>

一次大戰爆發，李卜克內西反對德國向俄國宣戰，他不顧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規獨自投下反對票反對戰爭信貸的議案，更提倡以德國國內革命抵抗軍國主義者發起的國際戰爭。<sup>53</sup> 1915 年他在第一份德國出版的地下小冊子發表〈主要敵人在家國之內！〉 (*Der Hauptfeind steht im eigenen Land!*)，解說全面反戰的立場，還勸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主義者，「為了社會主義精神之下的和平，請您們參與國際的階級鬥爭，反抗秘密外交政策的陰謀、反抗帝國主義、反對戰爭」。<sup>54</sup> 《火線》最後一章〈黎明〉 (*L'Aube*)，正描述德法兩軍在大雨下經歷戰壕惡戰，雙方兵士走避炮彈之際造就了戲劇性的交流機會：他們在摒絕戰爭的呼喚之下討論「戰爭的意義」。小說或多或少循着李卜克內西相近的思路，指出永絕戰爭的方法並非消滅眼前的敵人 (德國) 那麼簡單，亦非單純針對黷武主義或極端的愛國主義，它主張團結世界民眾進行階級鬥爭：

<sup>50</sup> 參考 Henri Barbusse, "Lettres du 8, 13 et 13 soir, octobre 1916," in *Lettres de Henri Barbusse à sa femme, 1914–1917*, pp. 224–27。

<sup>51</sup> Karl Liebknecht, *Militarism and Anti-militarism*,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Sirni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S. Foner (New York: Dover, 1972).

<sup>52</sup> Karl Liebknecht, "D'où viendra la Paix?," *Le Socialisme*, Le 2 novembre, 1912. Repris sur le site "La Bataille socialiste," consulté le 9 août, 2018. URL: <https://bataillesocialiste.wordpress.com/documents-historiques/1912-11-d%E2%80%99ou-viendra-la-paix-liebknecht/>.

<sup>53</sup> Karl Liebknecht, *La flamm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Brochure de Critique Sociale, 2014), pp. 4–5.

<sup>54</sup> Karl Liebknecht, "Der Hauptfeind steht im eigenen Land!," in idem, *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 Dietz Verlag, 1952), pp. 296–301; Karl Liebknecht, "The Main Enemy Is At Home!" (Leaflet, May 1915), trans. John Wagner,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Karl Liebknecht Internet Archive, consulté le 9 août, 2018. URL: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iebknecht-k/works/1915/05/main-enemy-home.htm>.

「我們必須鬥爭」! ……

「乃是因為我們為了一件良善的事在戰鬥著，並不是為了某國國家；我們是向一件錯誤作戰，並不是向一個國家作戰」。……

「那些盲目的愛國主義者 (les chauvins) ——他們都是些害蟲」，有一個陰影在咆哮著。……

「必需要將戰爭消滅——戰爭的本身」。<sup>55</sup>

「戰爭全是用普通兵士的血肉和靈魂構成的。造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正是我們。……戰爭就是我們，就是我們全體」。

「戰爭就是老百姓，沒有他們，就什麼都沒有……。可是決定戰爭的卻不是他們；乃是操控著他們的主子們」。

「老百姓今天正在為了不要再有操縱他們的主子們而鬥爭」。……

「全世界的人民應該有一種理解，通過那些多少在剝削著他們的人們的毛革，越過他們的屍體之上。一切的群眾都該贊同一致」。

「一切的人都應該平等」。<sup>56</sup>

「……我們！我們全體！」民眾之間相互理解，群眾間的團結，全世界民眾地位的提高，這淳樸的單純的信念！除這以外，其他的一切，是的，所有其他的一切，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一無足道。……「如果目前這戰爭能使進化跨前一步，則牠的災難和殺戮將算不了什麼」。<sup>57</sup>

其二，《火線》針對極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批判，乃至連結不同國族的無產階級，揭櫫「民眾之間相互理解，群眾間的團結，全世界民眾地位的提高」的國際主義思想，都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Proletarskiy internatsionalizm)的概念遙遙呼應；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又可視為巴比塞政治主張的另一思想來源。相關理念固然繼承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際主義思想，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概念卻是由列寧1913年發表的文章〈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正式提出的。就狹隘的民族主義和階級利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關係，列寧清楚表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口號，這兩個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sup>55</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九十五)、(九十六)，《立報·言林》，1940年6月6、7日；Barbusse, *Le Feu*, pp. 424–26。

<sup>56</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九十九)、(一〇〇)，《立報·言林》，1940年6月10、11日；Barbusse, *Le Feu*, pp. 428–29。

<sup>57</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一〇六)，《立報·言林》，1940年6月17日；Barbusse, *Le Feu*, p. 439。

的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口號，代表着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也是兩種世界觀）。」<sup>58</sup>1917至1918年間，列寧因應國內外的政治形勢，進一步闡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涵義，清楚說明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卻參與戰事——即巴比塞的參戰立場——的政治理念基礎：「一切戰爭都是對民族使用強力，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者去贊成革命的戰爭。在社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叛徒）看來，基本問題，就是戰爭的階級性。」<sup>59</sup>列寧面對階級性的觀點，指出戰爭的性質並非由「誰先進攻和『敵人』在誰境內來決定」，並深入說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方向：

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所持的議論，則是另一樣的：戰爭底性質（是反動的或是革命的），不是以誰先進攻和「敵人」在誰國境內來決定，而是要看哪一階級進行這一戰爭，以及這戰爭所繼續的是哪一種政策來決定的。如果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由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底兩個世界集團所進行的戰爭，那末一切資產階級（連小國資產階級也在內）都變成了掠奪底參加人，而我這個革命無產階級代表者底任務，就是要準備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戰爭慘禍的唯一救星。……這才是國際主義，這才是國際主義者、革命工人、真正社會主義者底任務。<sup>60</sup>

誠然，巴比塞的政治主張在戰後1919年出版的小說《光明》（*La Clarté*）才得到更為清晰的演繹，也影響了往後他和戰友所創立國際左翼文藝家團體「光明社」（*Le Groupe Clarté*, 1919–1928）及其機關刊物《光明》（*La Clarté*, 1919–1921年由巴比塞主編）的政治傾向，是以列寧也曾讚揚《火線》和《光明》描寫群眾的革命意識。<sup>61</sup>

<sup>58</sup> V. I. Lenin,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idem,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vol. 20, p. 26；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頁339。列寧對極端愛國主義的批判，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以後（1917、1918年間）有更系統的論述，主要仍是針對戰爭的階級性質：「從無產階級觀點上看來，承認『保護祖國』，就是替現在的戰爭辯護，就是承認它的合理性。但既然戰爭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論在君主制下或在共和制下，不論此刻敵軍是在我國境內或在他國境內，都是一樣），那末承認保護祖國，實際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強盜資產階級，就是完全叛變社會主義。」見 V. 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in idem, *Selected Works*, vol. 3, p. 113；列寧（著）、解放社編輯部（譯）：《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延安：解放社，1950年），頁103。

<sup>59</sup>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p. 116；列寧（著）、解放社編輯部（譯）：《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頁109。

<sup>60</sup>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p. 117；列寧（著）、解放社編輯部（譯）：《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頁111–12。

<sup>61</sup> V. I. Lenin, “The Task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Ramsay MacDonald o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in idem, *Collected Works*, p. 509: “As one of the particularly striking confirmations

### (三) 同途異路：國際主義之下不同的革命道路

同樣主張超越國族界限反對一次大戰的羅曼·羅蘭，曾稱譽《火線》為「戰爭的一道完美鏡子」(un miroir implacable de la guerre)。他認為巴比塞作為戰爭見證人的聲音，完全揭穿那些美化粉飾歐洲屠殺者的謊言，並對小說描述無產階級軍隊與敵人最終能友愛團結的願景，予以肯定：

一線的陽光不會使天空明亮；一個兵士的意見也不等同一隊軍隊的意見。現在的軍隊正如一眾國族，各國之內多種思潮都在互相衝突和混合。巴比塞的《日記》〔《火線》的副題為「一個步兵班的日記」〕是一隊幾乎全由勞工與農民組成的步兵班的日記。但在這卑下的人民之中……，在這無產階級的軍隊之中隱隱約約形成了普遍人性的觀念，在法國響起如此無畏的聲音，這些抗爭的人民英勇竭力的擺脫當下的苦難以及迫近的死亡，為求夢想敵人的友愛團結。在此，我看見超越一切勝利的偉大，隨著戰事而來光榮的苦痛，我期望，它亦將要終結。<sup>62</sup>

一次大戰期間，羅曼·羅蘭雖同樣堅持反戰立場，但他對巴比塞的《火線》卻非全然贊同：「〔此書〕主要的印象是極度客觀的；除最後一章明確表示作者的社會觀點，我們不能完全認同。」<sup>63</sup> 羅曼·羅蘭「不能完全認同」的，正是小說最後一章〈黎明〉提

〔上接頁171〕

of the phenomenon observable everywhere, on a mass scale, namely, that of the growth of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masses, we may take the novels of Henri Barbusse, *Le Feu* (Under Fire) and *Clarté* (Light). The former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nto all languages, and in France 230,000 copies have been so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bsolutely ignorant rank-and-filer, utterly crushed by philistine ideas and prejudices, into a revolutiona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 is depicted with extraordinary power, talent and truthfulness.”

<sup>62</sup> Romain Rolland, “Le Feu,” *Journal de Genève*, Le 19 mars, 1917: “Un rayon de soleil ne fait pas le ciel clair; et la voix d’un soldat n’est pas celle d’une armée. Les armées d’aujourd’hui sont des nations, où sans doute s’entre-choquent et se mêlent, comme dans toute nation, bien des courants divers. Le *Journal* de Barbusse est celui d’une escouade, composée presque exclusivement d’ouvriers, de paysans. Mais que dans cet humble peuple, . . . - que dans ce prolétariat des armées se forme obscurément une telle conscience de l’humanité universelle, - qu’une telle voix intrépide s’élève de la France, - que ce peuple qui combat fasse l’héroïque effort de se dégager de sa misère présente et de la mort obsédante, pour rêver de l’union fraternelle des peuples ennemis, - je trouve là une grandeur qui passe toutes les victoires et dont la douloureuse gloire survivra à celle des batailles, - y mettra fin, j’espère.”

<sup>63</sup> Romain Rolland, “Le Feu,” *Journal de Genève*, Le 19 mars, 1917: “L’impression qui domine est d’une extrême objectivité. Sauf au dernier chapitre, où s’affirment ses idées sociales, on ne connaît point l’auteur.”

及以無產階級革命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由此隱隱透露了兩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在戰爭語境下探索社會改革，追求平等、自由、博愛等人類精神價值的不同路徑，也預示了他們在俄國十月革命、一次大戰結束以後隨即展開的論爭。

這場法國思想史上的著名論戰，有助我們辨識《火線》在巴比塞革命思想發展上的啟示作用。<sup>64</sup> 戰爭結束翌年，羅曼·羅蘭在《人道報》發表〈精神獨立宣言〉(La Déclaration de l'indépendance de l'Esprit)，向全球知識分子發出號召。他委婉地指出，戰事期間不少知識分子自願屈服於狂暴的力量，讓他們的理性、科學知識和藝術為執政政府所用。〈宣言〉號召知識分子重新團結，建立友愛 (la fraternité)，高舉永恆的自由精神 (L'Esprit du libre)，結果得到巴比塞以及法國以外十多個國家的知識分子聯署支持。<sup>65</sup> 同年，巴比塞也創立了光明社，將各國的進步文藝家組織起來，繼續反抗帝國主義。<sup>66</sup> 可是羅曼·羅蘭對此組織卻一直默不作聲，更拒絕加入。1921年12月，巴比塞率先在光明社的機關刊物《光明》發表文章〈另一半的責任——關於羅蘭主義〉，指責大部份的「精神工作者」(travailleurs de l'esprit)——借用羅曼·羅蘭的說法，所指包括作家、藝術家、思想家等知識分子——為保守主義者，在大時代、政治權力達至最高峰的時刻，他們的功能只限於裝飾和宣傳。他繼而批評當時以羅曼·羅蘭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雖極力責難舊有的社會制度，而無實質行動，其實只盡了知識分子一半的責任。因此要求他們走出這種「高尚而可怕的軟弱」(cette noble et terrible impuissance)，重新投入革命抗爭。<sup>67</sup> 1922年1月至4月間，羅蘭和巴比塞分別在《自由藝術》月刊 (L'Art libre) 及《光明》連續發表公開信，回應和反駁對方的觀點，過後還引起歐洲知識分子的廣泛討論。<sup>68</sup>

<sup>64</sup> 參考 David James Fisher, *Romain Rol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80–112。

<sup>65</sup> 此文發表時，題為〈知識分子的忠實宣言〉，後被論者稱為〈精神獨立宣言〉。參考 Romain Rolland, “Un appel: Fièvre déclaration d'intellectuels,” *L'Humanité*, Le 26 juin, 1919, p. 1。同年，張崧年據英文譯本轉譯此文，初刊於《新青年》，修訂後刊於《新潮》第2卷第2期 (1919年12月)，頁374–94。

<sup>66</sup> 巴比塞曾出版《深淵之光——「光明社」追求甚麼》一書，詳述光明社組織的背景及目的。參考 Henri Barbusse, *La lueur dans l'abîme: ce que veut le groupe Clarté* (Paris: Edition Clarté, 1920)。另參考 Alain Cuenot, “Clarté (1919–1928): du refus de la guerre à la révolution,” *Cahier d'histoire. Revue d'histoire critique* 123 (2014), pp. 115–36。

<sup>67</sup> Henri Barbusse, “L'autre moitié du Devoir: A propos du « Rollandisme »,” *Clarté* 2 (Le 3 décembre, 1921), pp. 25–26。

<sup>68</sup> 1922年3月《自由藝術》月刊組織「精神獨立：羅曼·羅蘭號召的回應」專號，刊載了布蘭德斯 (Georg Brandes, 1842–1927)、韋爾特 (Léon Werth, 1878–1955)、麥綏萊勒 (Frans Masereel, 1889–1972)、羅曼 (Jule Romains, 1885–1972) 等二十多位歐洲知識分子的回應。參考 “L'indépendance de l'Esprit: Réponses à l'appel de Romain Rolland,” *L'Art libre* (mars 1922), pp. 33–44。

羅曼·羅蘭回應巴比塞的質疑，開宗名義表示：（一）作為「新馬克思主義派」的共產主義學說（Communisme néo-marxiste）——主要指列寧的觀點，在理論層面而言，採取絕對的形式主義，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並不符合人類真正的演化進程；（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亦正好從社會實際運作的層面，說明共產主義的實踐導致可悲和殘酷的謬誤。「這些新社會的首領常常因為對抗的原故，便把最高的精神的價值都犧牲了：人道，自由，以至比所有比一切還寶貴的真實」。<sup>69</sup>羅曼·羅蘭曾經同情布爾什維克，熱心支持過俄國進行「宏偉的社會實驗」，卻因為革命以後執政者的手法問題，促使他斷定人道（l'humanité）、自由（la liberté）、真理（la vérité）的追求，是無法經由政治黨派實現的：

因此我堅決的相信你〔巴比塞〕對於共產主義能夠盡的最大的責任，並不是替他鼓吹，是為他作一個誠實的批評——只有一個人，在黨派裏，能夠盡量的應用他的判別的自由：就是列寧（Lenine）。……共產主義者，你該當勉為自由的人！用功不斷的改革你的工作。自己要敢于將自己的錯處指出，將自己的過甚改去。……一言以蔽之，只要服役革命的精神是狹義的政治的意味，而鄙薄自由良心的要求，呼他為「無所主張」〔anarchisme，今譯無政府主義〕或「感情用事」〔sentimentalisme〕——我便一點也不遲疑的在一起首便抽開身子。<sup>70</sup>

羅曼·羅蘭以為政治黨派主導之下，共產主義者「還是犯了不公平的攻擊，或是為黨的勝利的不慈仁的行事」，<sup>71</sup>背後針對的正是十月革命以後蘇共上層領導實行的殘暴統治。他在往後的討論裡更清晰地指出，他們的公敵其實是目前社會所見的壓制暴力，故不能認同巴比塞及共產主義者提倡「以暴易暴」的方法（une violence adverse），因為「那種方法只能生出互相破壞的結果」。<sup>72</sup>

<sup>69</sup> Romain Rolland, “Lettre ouverte à Henri Barbusse” (Le 14 décembre, 1921), *L'Art libre* (Janvier 1922), p. 1；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28。

<sup>70</sup> Rolland, “Lettre ouverte à Henri Barbusse” (Le 14 décembre, 1921), p. 2: “Aussi, je crois fermement que le plus grand service que vous puissiez rendre à la cause communiste, ce n'est pas d'en faire l'apologie, mais la critique franche et vraie. – Un seul homme, dans le parti, exerce, en sa plénitude, cette indépendance de jugement: c'est Lenine. . . . Communistes, soyez des hommes libres! Travaillez à corriger incessamment votre œuvre, en osant signaler vous-mêmes ses erreurs et combattre ses abus. . . . [E]n un mot, tant que l'esprit des servants de la d'« anarchisme » ou de « sentimentalisme », les revendications sacrées de la libre conscience, – je me tiendrai à l'écart, sans illusions sur l'issue du combat.” 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29。

<sup>71</sup> Rolland, “Lettre ouverte à Henri Barbusse” (Le 14 décembre, 1921), p. 2；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29。

<sup>72</sup> Rolland, “Lettre ouverte à Henri Barbusse” (Le 14 décembre, 1921), p. 2；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33–34。

面對羅曼·羅蘭指斥他們以暴政取代暴政 (*remplacer une tyrannie par une autre*)——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同時卻又另生一種「主義」，巴比塞以戰後歐洲社會的現實處境說明問題的關鍵：「我們以為其實該當以一個事物的狀態去代替其他的事物狀態，以一個組織去代替其他的組織。因為再沒有別的方法去使社會人為的創痛消滅了去。……我們該當用力，該當以一些法律去代一些法律。我們就是隨着這個〔理性和正義〕的路子去定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思想的趨向。」<sup>73</sup> 巴比塞再三強調，他之所以對「羅蘭主義」知識分子感到不滿，是因為「他們不該當只限于否定的態度，而在實行上沒有貢獻一點真實和可行的辦法」。<sup>74</sup> 至於羅曼·羅蘭提出對抗社會壓制暴力的「另一種武器」，即借用印度獨立運動精神領袖甘地 (*Mahatma Gandhi*, 1869–1944) 所提倡的良知的抗拒 (*Objecteurs de conscience*) 又或不受主義 (*La Non-acceptation*)。<sup>75</sup> 在巴比塞來說，這些方法都反面說明革命運動在現實處境進行中，群體領導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他以為和平革命包括罷工等方式，本來就是光明社所支持的抗爭手段，但這種英雄式的無抵抗主義，最終還是得倚靠群眾目標一致的組織，「別人所能想像的那種個人良心的承諾，是無能力得最大的結果的」。<sup>76</sup>

從兩位法國反戰作家代表的論戰文章，再整合理解巴比塞於筆戰發生以前在《人道報》發表的〈社會主義者之天職〉一文，<sup>77</sup> 我們得以全面窺見一次大戰以後巴比塞極力探索在保持平等、獨立的前提下，左翼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形式。思想和行動之間，每一步的取捨都危險重重，如臨深淵，其中兩點值得關注：其一，縱使戰後由巴比塞組織的退伍軍人共和協會 (*Association républicain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sup>73</sup> Henri Barbusse, “A propos du Rollandisme,” *Clarté* 6 (Le 1 février, 1922), pp. 127–28: “Nous estimons qu’il faut, en effet, remplacer un état de choses par un autre, et une organisation par une autre, car il y n’y a pas d’autre moyen de faire disparaître les plaies artificielles de la société. . . . [I] faut agir, et remplacer des lois par des lois. C’est dans cette voie de raison et de justice constructive que nous entendons orienter les prolétariats.” 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31。譯文略經修訂。

<sup>74</sup> Henri Barbusse, “A propos du Rollandisme,” *Clarté* 10 (Le 1 avril, 1922), p. 223；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34。事實上，巴比塞回應羅曼·羅蘭第一封公開信時已曾提及相同觀點：「如果別人限定了精神的工作只在批評和詛咒上用力，而不加入直接的實施裏面，未免把他美的事業停止太早了，未免太不管當前的憂患了。」見 Barbusse, “A propos du Rollandisme,” *Clarté* 6, p. 128: “[L]orsqu’on borne le travail de l’esprit à la critique et à la récrimination sans entrer dans la réalisation positive et directe, on arrête trop tôt son beau rôle, et on se détache de la solution des renaissantes misères.” 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31。

<sup>75</sup> 羅曼·羅蘭的文章自注參考甘地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1909) 以及 *Swaraj in One Year* (1921) 二書。

<sup>76</sup> Barbusse, “A propos du Rollandisme,” *Clarté* 10, p. 224；李璜：〈記巴爾比斯與羅曼羅蘭的筆戰〉，頁35。

<sup>77</sup> Henri Barbusse, “Le Devoir Socialiste,” *L’Humanité*, Le 24 octobre, 1920, pp. 1–2.

ACRC) 和光明社均強調不直接參與政黨政治，但不得不承認集團生活之中，政治才是機制的實現者 (le mécanisme réalisateur)。政治與人道主義相互交織，密不可分。<sup>78</sup> 其二，巴比塞較諸羅曼·羅蘭，更願意從現實角度考量戰後歐洲社會改革、追求平等的政治策略。巴比塞既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發，也面對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分裂的嚴峻處境，以為當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毫無保留地聯繫極端主義者，因為要廢除階級，必須依靠獨裁的無產階級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正如莫斯科利用理性的獨裁力量重建、維持革命後的新秩序一樣。巴比塞甚至斷言，人們設想有其他方法實現公平社會，只是一種應受遣責的無知 (une coupable naïveté)。<sup>79</sup> 歷史證明，隨着戰後法國社會和新俄政局的急遽發展，不論巴比塞還是羅曼·羅蘭，對於共產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回應都複雜多變，往後他們各自跟蘇共的關係也變得異常糾結。<sup>80</sup>

### 三、以「另一場戰爭」消滅戰爭：抗日戰爭語境下的《火線》翻譯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露戰爭殘酷、強調反思一次大戰的反戰文學，顯然與當時中國急切發動一切力量抗日的局勢要求「不再合轍」。不僅民族主義者認為反戰宣傳消弭民心，無助召喚中國人民奮勇抗敵；中共和左翼陣營也意識到非戰思想的「階級調和性質」，未能為階級革命以至目下戰爭指示出路。他們因應政治需要，對國外的反戰文學，包括震動全球的德國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及其話劇和電影改編，加以批判，以期逆轉反戰思想的主流位置以及群眾對反戰文學的熱情。<sup>81</sup> 相對而

<sup>78</sup> 1917年巴比塞成立的「退伍軍人共和協會」至今仍然運作，成立初期協會名稱幾經改易，《人道報》所載〈社會主義者之天職〉一文裡巴比塞即稱之為「退伍軍人國際」(L'International des anciens combattants)。見 Barbusse, "Le Devoir Socialiste," p. 1。

<sup>79</sup> Barbusse, "Le Devoir Socialiste," p. 1。

<sup>80</sup> 1935年可視為兩位法國左翼作家與蘇共關係發展最戲劇性的一年，該年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均到蘇聯訪問。三十年代初巴比塞因為他主編《世界》週刊 (*Monde*) 的編輯方向問題，引來蘇共的不滿，蘇聯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屬下六位作家更聯署公開信函加以指責，巴比塞亦公開回應，後稱「《世界》事件」(L'Affaire *Monde*)。1935年巴比塞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因病逝世。同年，羅曼·羅蘭應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8–1936) 之邀訪問蘇聯，之後撰寫了《莫斯科之旅》(*Voyage à Moscou, juin-juillet 1935*)。此書大肆批評蘇共政策和當時蘇聯社會的情況，卻規定必需封存至他逝世後五十年方能出版。有關《世界》事件的史料考證，參考鄭可怡：《黑暗的明燈》，頁42–48。另參考 Romain Rolland, *Voyage à Moscou, juin-juillet 1935*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92)。

<sup>81</sup> 李今整理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戰爭文學翻譯，在此基礎上學者進一步探討《西線無戰事》非戰思想與當時抗戰的複雜政治語境。羅執廷比較分析《西線無戰事》在中國三十年代的翻譯、重譯、話劇和電影改編及其所受到的批評，進而指出民國時期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以及帝國主義侵略所構成的一個多維度、多向度甚至自相矛盾的話語空間，促使「非戰」話語以後出現階級革命話語和民族國家話語共同表現的「尚戰」傾向，觀點具啟發性。見李今：《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三四十年代·俄蘇卷》，頁13–16；吳曉東：〈《西線無戰事》與三十年代的「非戰小說」〉，《中國文學學報》第3期(2012年)，頁35–36；羅執廷：〈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與民國時期的非戰 / 尚戰話語〉，頁140–51。

言，當時的知識分子有意曲解巴比塞「以戰抗戰」的主張，《火線》也從「反戰」文學被刻意解讀成為革命抗爭、民族解放的作品。如三十年代由夏丏尊、葉聖陶創辦的《中學生》雜誌，在巴比塞逝世後介紹他的反戰、反帝國主義思想及相關小說《砲火》（即《火線》），最後更鼓勵青年讀者堅持「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現在，又是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了，我們的戰士之一〔指巴比塞〕卻已經離開這世界；我們不用歎息，（歎息是羞恥的行為）我們只要繼續他的遺志奮鬥！」<sup>82</sup>1936年在北京創刊的抗戰刊物《新潮》也發表多篇文章，利用巴比塞的《火線》和他的言論作為抗戰宣傳。其中〈世界大戰與前衛作家〉一文，主張以社會主義革命對抗德、日、意發動的資本主義戰爭，又引述巴比塞的話「唯有××（案：「階級」）戰爭才能消滅戰爭！」作為抗戰的號召，表明「我們要以我們的武器來轉變這對人類屠殺的『戰爭』而為人類解放的『戰爭』」。<sup>83</sup>又〈作家與戰爭〉一文，借用巴比塞的遺言，呼籲知識分子從事革命、頑強抗戰：「已經覺悟的作家，已經脫離了普通的愚妄與理解——的作家，必須與社會組織的解放者，改革者結合不可，並且同勞動者貫聯起來，——在我們所處的今日，只有勞動者才能把被投進深淵狂流中的現代人及後代人援救出來。……讓作家公開的，清楚的，並且正直的要站在被剝削的一面來反抗剝削者，站在被壓迫的一面反抗壓迫者的。」<sup>84</sup>由此觀之，葉靈鳳在瀕臨淪陷的香港選譯《火線》，並強調巴比塞「在侵略戰爭的火燄瀰漫全世界」之時主張以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另一種戰爭」消滅戰爭，皆非偶然。<sup>85</sup>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以後，葉靈鳳跟隨《救亡日報》（1937–1941）編輯部從上海南下廣州。1938年廣州失陷前夕，葉靈鳳抵達香港，成為戰時的「留港文藝工作者」。<sup>86</sup>他與不少南來文人都希望利用殖民地「偏安」的政治環境，以及聯繫國統區、

<sup>82</sup> 徐調孚：〈巴比塞及其「炮火」〉，《中學生》第58期（1935年10月），頁14。

<sup>83</sup> 霞：〈世界大戰與前衛作家〉，《新潮》創刊號（1936年3月），頁6。

<sup>84</sup> 〈作家與戰爭〉，《新潮》創刊號（1936年3月），頁4。同期《新潮》還刊載〈亞洲局勢新展望〉一文，討論日本朝野擔憂中國民眾武裝抗日戰線，同頁介紹巴比塞《火線》描述一次大戰軍人醒覺的故事。參考高索（譯）：〈亞洲局勢新展望——日本朝野杞憂的是中國民眾武裝抗日戰線〉，《新潮》創刊號（1936年3月），頁2。此文選譯了《紐約時報》、《新群眾》發表的文章片段。

<sup>85</sup> 葉靈鳳：〈譯者後記〉，《立報·言林》，1940年6月17日。

<sup>86</sup>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翌年6月成立香港分會（初時只用「留港會員通訊處」之名），九位當選幹事包括葉靈鳳、樓適夷、許地山、戴望舒等。1939年3月，葉靈鳳在自己主編的《立報·言林》發表文章，回顧「文協」成立一週年之際，指出「留港的文藝工作者」的責任：「遙對著祖國，留港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一面克服身邊的困難，說服爭取工作圈外的同伴，一面利用環境負起一個運輸站的責任，將淪陷區民眾的希望和世界的同情寄回祖國，再將祖國新生的氣息傳遞到黑暗的区域和全世界。」見葉靈鳳：〈留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遙祝文協總會一周年紀念〉，《立報·言林》，1939年3月26日。參考文通學社：〈「文通」簡史〉，載文通學社（編）：《歷史的軌迹》（香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3；絲韋：〈葉靈鳳的後半生〉，頁346–52。

解放區、淪陷區和國外的特殊位置，繼續進行抗戰文藝活動。<sup>87</sup>當時英國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港督羅富國 (Geoffry Northcote, 1881–1948) 於 1938 年 9 月宣布香港為「中立」地區 (natural zone)，對各國開放而不介入中日戰爭。為了限制抗日言論，香港政府對報刊雜誌實施嚴苛的審查制度，寓禁於徵，<sup>88</sup> 審檢法例，<sup>89</sup> 結果導致編輯和作者自

<sup>87</sup> 抗日戰爭中香港佔有特殊位置，茅盾說周恩來在皖南事變 (1941 年 1 月 7 至 13 日) 後建議他到這片英屬殖民地開辟新陣線，指出香港「所處的地位很重要，是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和海外華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愛國僑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內地與上海孤島聯繫的橋樑。萬一國內政局發生劇變，香港將成為我們重要的戰鬥堡壘」。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頁 251。

<sup>88</sup> 香港自「七七事變」抗戰爆發至日軍佔領以前文學出版審查制度的研究不多，不過憑藉已公開的法律文件和時人文章，並借助近年西方有關文學審查形式研究的分類框架，仍可概括勾勒當時的審查制度。扼要地說，港英政府立法建立報刊雜誌出版的登記制度，釐定「督印人」、「編輯」、「出版者」、「發行人」等概念及其法律責任，註冊時課以保證金。當時著名編輯陸丹林 (1896?–1972) 曾多次撰文，論述 1938–1940 年間港英政府對創辦刊物的嚴格限制，除必須向政府特設機關「華文政務司署」登記資料正式備案以外，還需向庫務處繳交保證金 3,000 元，當時折合約國幣 11,100 元。陸丹林以為在香港創辦一種定期刊物，需要準備最少 20,000 元國幣，資金龐大，相對國內只要與印刷公司商議，不費一文也能辦定期刊物的情況，在香港辦華文刊物其實相當困難。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以八十年代香港政府《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規定註冊費用 785 元進行比較，指當時的保證金與八十年代相差千倍，一般人根本無能力辦報，是以「寓禁於徵」的方法限制言論 (此書誤記抗戰初期政府要求的保證金為 2,000 元)。必需指出，保證金 3,000 元的要求沿自 1927 年港府在「省港澳大罷工」以後對《承印人與出版人條例》的修訂，並非戰時香港宣布為中立城市後才特別提升金額。查 1997 年《報刊註冊及發行規例》註冊費用仍為 785 元，每年另須繳付年費 785 元；2017 年註冊費用則改為 1,140 元，年費 895 元，維持至今。相比之下，三十年代保證金的要求對出版刊物還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參考陸丹林：〈在香港辦刊物〉，《黃河》(西安) 第 3 期 (1940 年 4 月)，頁 101–2；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 年)，頁 153–58；“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 No. 25 of 1927,” *Printer and Publishers*, p. 1720. Th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oelawhk.lib.hku.hk/archive/files/b0a1dc7580f92e380f54b7bd6d9e5b4e.pdf> on 28 December 2018; “Cap. 268B Newspapers Regis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Regulations” (1997.7.1), Hong Kong e-Legisl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68B!en@1997-07-01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912455\\_001](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68B!en@1997-07-01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912455_001) on 28 December 2018; “Cap. 268B Newspapers Regis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Regulations” (2017.3.31), Hong Kong e-Legisl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68B!zh-Hant-HK@2017-03-31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912455\\_002](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68B!zh-Hant-HK@2017-03-31T00:00:00?INDEX_CS=N&xpid=ID_1438402912455_002) on 28 December 2018。

<sup>89</sup> 1938–1941 年間，港英政府的審查制度可明確分為出版前及出版後的審查，所有定期刊物於出版前必須向華文新聞紙檢查處送樣兩份，檢定後才能付印。刊物出版首天，督印人需在刊物簽字，再送交華文新聞紙檢查處存查，相關程序均列入法律條文。審查工作由政府指派的審查員負責，但審查的原則和具體內容則沒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序，法律條文〔下轉頁 179〕

我審查。<sup>90</sup>不過，相對國內的淪陷區，香港仍是抗戰宣傳的主要據點。幾種來港復刊的報章大張旗鼓，聘請知名作家主編副刊，以期支援抗日文藝，其中有由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以及先後由茅盾、葉靈鳳主編的《立報》副刊〈言林〉。<sup>91</sup>葉靈鳳利用〈言林〉在各種政治力量協商之下尚能保存的言論空間，不僅發表宣傳民族主義的文章，還在日本強權鼓吹「和平文藝」的氛圍下刊載主張以戰爭進行階級革命的翻譯小說《火線下》。葉靈鳳以文學翻譯作為「內在抵抗」的策略，固然有時局的

〔上接頁178〕

也沒向公眾說明。據陸丹林所述，當時審查內容主要分為政治和道德兩方面，不過審查員關注政治敏感的議題遠超於誨淫敗德的寫作，主要針對刊物有關日軍的描述、政治議論中的「惡劣名詞」，又或涉及英國的如鴉片戰爭等。1938年日本駐港領事常常和香港政府交涉，要求「取締抗日文字」，華民政務司遂向各種刊物負責人分發一紙印上刪禁字眼的通知，聲明「敵，倭奴，倭夷，蝦夷，島夷，東虜，日寇，暴日，獸行，獸性，獸兵，強盜，無恥，焚劫，姦淫，擄掠，屠殺，以及其他類似此等字句者」，一概不准使用。文章犯禁的字詞會被審查員以符號「□」代替，批評日軍的文章更會全文刪除，印上「全文被檢」等字眼，即俗稱的「開天窗」。茅盾回憶在港主編《立報·言林》，同樣提及有關情況，並因此決定同期編輯的《文藝陣地》不在香港出版：「一本鼓吹抗戰的文藝刊物，卻把所有抗敵的字眼換成『××』，在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文藝陣地》是面向全國的大型刊物，它不能受制於香港這彈丸小島。」見陸丹林：〈續談香港〉，《宇宙風》第11期（1939年8月），頁501-2；陸丹林：〈香港的文藝界〉，《黃河》創刊號（1940年2月），頁19；陸丹林：〈在香港辦刊物〉，頁10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頁56。

<sup>90</sup> 出版前的政治審查必然引起刊物編輯和作者的自我審查。戰時陸丹林在香港復辦《大風》旬刊（後改為半月刊），即向投稿者明言：「內地投稿的文友們，應該曉得與原諒我們的環境，寫稿時留心一點，例如敵、倭寇、蝦夷、獸行、獸性、暴寇等字，都不要用；舉一反三，其他可知。」他又從編輯的角度表示：「刊物上的文字就要設法避去，否則成了空格（開天窗）很難看的了。」茅盾憶述在《立報》發表抗日長篇連載小說《何去何從》時，薩空了便因政治原因建議他另改小說題目：「因為《立報》的老板看了〈楔子〉，認為這個題目太有點刺激性，怕惹起麻煩，說：『何必在題目上就攤牌呢？』建議改為《你往哪裡跑》。薩空了勸我從工作出發讓一步。」參考陸丹林：〈復版贅言〉，《大風》第24期（1938年12月25日），頁737；陸丹林：〈香港的文藝界〉，頁19；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下），頁53。政治審查之下，編輯和作者都以協商的方式寫作和出版，並透過種種創新、突破的形式，確保僅有的言論空間不致收縮，於是形成了特定時期政治監控之下，某種傳遞訊息的文學符號系統或功能含混技巧加速發展，甚至建構作者、讀者以及審查者互相協商、共同接受的言論空間。相關問題非常複雜，值得另文再議。參考 Annabel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idem, *Censorship and Interpretation: The Condi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p. 3-31; Michel Hockx, "The Power of Writing: Censorshi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ry Value," Chap. 7 in idem,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p. 222-51。

<sup>91</sup> 詳見陳智德：〈導言〉，載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64-67。

考量，但其實他早於二十年代便開始譯介俄、法兩地的左翼文學；及後在抗日呼聲之下再次動用兩地文學資源，<sup>92</sup>其中也包含了個人對國際左翼思潮發展的回應。

### (一) 現代派的先鋒性：俄法左翼文藝的翻譯

葉靈鳳於1928年開始引介俄、法兩地的左翼作家，為中國社會和文藝的革新尋求先導。那時他已脫離創造社，<sup>93</sup>之前因為發表〈女媧氏之遺孽〉(1925)、〈菊子夫人〉(1926)和〈浪淘沙〉(1926)等弗洛伊德學說影響下的心理分析小說，在文壇上略有名聲。論者少有關注葉靈鳳早期對左翼文藝的譯介，原因除了本文開首提及的個人政治因素，從文藝觀點而言，主要理由有二：其一，縱然創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計」離散的原因複雜多面，但仍有不少學者歸因於葉靈鳳的「唯美派」文藝取向與後期創造社的政治傾向產生矛盾，認為他加入創造社不足兩年，已經「與友人另組『幻社』，創辦聲明不屬創造社刊物的《幻洲》半月刊」，表現出「游離於日益高漲的創造社左傾思潮，另辟藝術綠地的傾向」（「『幻洲』是世界語 OAZO 的譯音兼譯意，即沙漠中的綠洲」）。<sup>94</sup>1930年葉靈鳳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翌年「左聯」便以「完全放棄了聯盟的工作」為由將他開除，<sup>95</sup>因此更少論者關注葉靈鳳與左翼思潮的關係。其二，論者針對葉靈鳳早期有關性慾和心理分析的小說寫作以及編輯活動，將他視

<sup>92</sup> 葉靈鳳在主編〈言林〉期間發表三篇國外長篇小說的翻譯：一是巴比塞的《火線》，二是蘇聯拍夫朗訶(Pyotr Pavlenko, 1899–1951)的《紅翼東飛》(*Red Planes Fly East*, 1938)，三是費雷爾曼(Ruvim Frayerman, 1891?–1972)的《早戀》(*The Dingo: A Story of First Love*, 1938)。參考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紅翼東飛〉(一至二四〇)，《立報·言林》，1939年3月1日至11月21日；費雷爾曼(著)、葉靈鳳(譯)：〈早戀〉(一至一五一)，《立報·言林》，1940年8月21日至1941年2月1日。至於中日戰爭時期葉靈鳳翻譯的詳細情況，可參考鄭可怡整理的「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作家翻譯資料庫」(URL: <http://www.transchimodern.hk/>)。

<sup>93</sup> 1925年葉靈鳳經郭沫若介紹，加入創造社，並參與《洪水》半月刊的編輯工作。翌年3月，創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10月，葉靈鳳、潘漢年、周全平、邱韻鐸等出版部的「小伙計」另外成立「幻社」，「私自集資」出版《幻洲》半月刊，宣稱與創造社出版部無關。《幻洲》上半部「象牙之塔」刊載文藝作品，由葉靈鳳主編；下半部「十字街頭」專載雜文，由潘漢年主編。同年12月，郁達夫返滬整頓創造社出版部，葉靈鳳等幾位小伙計逐漸淡出創造社。有關創造社中心人物與出版部小伙計的內部矛盾，可參考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頁183–93。

<sup>94</sup>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633。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等創造社小伙計於1926年6月創辦《幻洲》周刊，至第二期便停刊，同年10月轉為出版《幻洲》半月刊。《幻洲》周刊創刊時，潘漢年曾撰文解說「幻洲」取名的意義。見潘漢年：〈幻想中的 OAZO〉，《幻洲》第1期(1926年6月12日)，頁3。

<sup>95</sup> 〈開除周全平，葉靈鳳，周毓英通告〉，《文學報導》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頁16。《文學報導》原名《前哨》，第二期更改刊名，乃左聯的機關刊物。

為「現代派」作家；後因他作品的先鋒特質，更將他歸入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文學流派「新感覺派」。<sup>96</sup>由於自三十年代始，左翼評論家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理解現代主義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衰落的文化，令往後很長時間裡中國現代派的寫作備受批評，以至現代派作家在時代轉折之際追求政治與藝術雙重先鋒性的特點，甚或在理論層面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美學思潮相互交疊的可能性，都沒有得到充份的探討。<sup>97</sup>

1928年，葉靈鳳將美國紐約出版的新俄小說集英譯本《飛行的奧西普》，轉譯為國內第二部最早的新俄作品選本《新俄短篇小說集》。<sup>98</sup>譯者在序言裡陳述了時代迫切要求知識分子對政治及文藝方向的抉擇：

是的，在後的將要在前，老的以前的黃金時代雖值得使人追憶，新進的粗淺的未成熟的雖不能止住你的鄙視，但好的終是已經老了的，終是過去的陳蹟，新的雖未完美，但她終是時代的驕子，終是眼前與未來的時代的主人。……於蘇維埃聯邦的新文藝是這樣，於我們文壇上這新進的文藝也是這樣。……

國內近來似乎也有人在鬧「革命的文學」，但是我覺得這不僅是喊喊就可成就的事。無產階級的作家不會寫出資產階級的作品，與安間的小資階級思

<sup>96</sup> 吳福輝認為葉靈鳳自1931年以後嘗試寫作真正意義的先鋒小說，發表了《紫丁香》、《第七號女性》、《憂鬱解剖學》和《朱古律的回憶》等，被評論者列入新感覺派。李今進而指出葉靈鳳屬海派之中更為趨向現代主義的「新感覺派」，與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大量譯介歐洲十九世紀末期的唯美頹廢(aestheticism and decadence)文藝運動的作品，其中包括戈恬(Théophile Gautier, 1811–1972)的小說《木乃伊戀史》(*Le Roman de la Momie*)，並引介愛爾蘭作家、詩人、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和英國插畫藝術家比亞茲來(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見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65–67；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3–55。

<sup>97</sup> 近年學者的嘗試可參考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頁86–105；鄺可怡：《黑暗的明燈》，頁15–17、232–58。

<sup>98</sup> 此書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收錄五篇作品，另附四千多字的介紹文章。據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卷二〈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頁279，它是國內出版最早的第二本新俄短篇小說中譯本。參考 *Flying Osip: Stories of New Russia*, selected by Alexander Chramoff, translated by L. S. Friedland and J. R. Piroshnikof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5)；葉靈鳳：〈新俄短篇小說集〉，頁12–13。無獨有偶，施蛰存、戴望舒等現代派作家也據 *Flying Osip* 譯介十九、二十世紀俄蘇作家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萊思珂夫(Nikolai Leskov, 1831–1895)、迦爾洵(Vsevolod Garshin, 1855–1888)、庫普林(Aleksandr Kuprin, 1870–1938)、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 Artsybashev, 1878–1927)、希式柯夫(Vyacheslav Shishkov, 1873–1945)等人的作品，刊載於1929年5、6月由上海水沫書店出版的《俄羅斯短篇傑作集》第一、二冊。

想的作者不會寫出無產的文學，是一樣不可能的事。我怕我們此刻不僅產不出革命的文學，恐怕張開眼來，可憐的我們是看不見革命，也看不見文學。但是，時代終是不容你等候的。Right or Left，這要看你自己的定奪。<sup>99</sup>

雖說翻譯新俄著作「並沒有甚麼野心」，<sup>100</sup>葉靈鳳還是利用有限資源，從政治立場不盡相同的作家群裡，選譯能夠表現十月革命以後俄國人民新生活的作品，展示「熱烈的，激動的，農工的，無產階級的世界」。<sup>101</sup>《新俄短篇小說集》一共轉譯五篇小說：描寫布爾什維克生活的皮利亞尼克 (Boris Pilnyak, 1894–1938) 〈皮的短衫〉 (Leather jackets) 以及愛羅索夫 (Aleksandr Arosev, 1890–1938) 〈領袖〉 (The soldiers)、卡薩多金 (Ivan Kasatkin, 1880–1938) 表現紅軍生活和精神的〈飛將軍〉 (Flying Osip)、同路人作家伊凡諾夫 (Vsevolod Ivanov, 1895–1963) 描述農軍作戰情形的〈軌道上〉 (On the rails) 以及無產階級女作家綏甫林娜 (Lydia Se fullina, 1889–1954) 以西伯利亞生活為背景的〈犯法的人〉 (The Lawbreakers)。

在《新俄短篇小說集》出版的同一年，葉靈鳳在與潘漢年合編的雜誌《戈壁》上，發表十九世紀俄國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爾 (Vera Figner, 1852–1942) 《一個革命者的回憶》的翻譯。<sup>102</sup>妃格念爾雖然出身貴族，卻寧願放棄富裕生活，成為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 (Narodnaya Volya) 的一員。因為參加了1881年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sup>99</sup> 葉靈鳳：〈新俄的短篇小說〉，載葉靈鳳（譯）：《新俄短篇小說集》（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頁1–2、13–14。

<sup>100</sup> 同上注，頁13。八十年代，葉靈鳳回顧年輕時編譯的《新俄短篇小說集》，再次提及出版動機：「當時的我還是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不要說在外國語文上的修養不夠，就是本國語文的運用也很幼稚，只是憑了一股熱情，大膽的嘗試了這工作，用來填補了當時出版界的這一類空虛，同時也暫時滿足了我自己以及當時同我自己一樣的許多文藝青年對蘇聯文藝的飢渴。因為當時是不大有機會能讀到蘇聯文藝作品的，就是我這本小小的短篇作品翻譯集，出版後沒有幾年，也就被禁止了。」見葉靈鳳：〈《新俄短篇小說集》〉，載葉靈鳳：《霜紅室隨筆》，收入《讀書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二集，頁12。

<sup>101</sup> 葉靈鳳：〈新俄的短篇小說〉，頁10、13。

<sup>102</sup> 1927年，妃格念爾《一個革命者的回憶》的英譯本出版，此書曾深切激勵巴金，不過他要待十五年後才把它翻譯出版（《獄中二十年》，1942年）。1928年5月《戈壁》半月刊創刊，葉靈鳳計劃據英譯本轉譯，在雜誌連載此書第二部的全文翻譯，可惜《戈壁》出版四期後被封，只發表了《一個革命者的回憶》第一至五章的譯文。參考 Vera 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trans. Camilla Chapin Daniels et 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7)；費格娜 (V. Figner) (著)、靈鳳 (譯)：〈一個革命者的回憶〉，《戈壁》第1卷第1期 (1928年5月1日)，頁32–47；〈一個革命者的回憶〉 (一續)，《戈壁》第1卷第2期 (1928年5月16日)，頁103–20；〈一個革命者的回憶〉 (二續)，《戈壁》第1卷第3期 (1928年6月1日)，頁158–73；〈一個革命者的回憶〉 (三續)，《戈壁》第1卷第4期 (1928年6月16日)，頁253–65。

(Alexander II, 1818–1881) 的行動，被捕繫獄二十餘年，其回憶錄曾燃點年青巴金對革命「獻身的熱望」。<sup>103</sup> 葉靈鳳的翻譯，目的是向當時的中國讀者展示「半世紀以前一位革命領袖」的精神。<sup>104</sup>

同是在1928年，葉靈鳳熱衷於引介法國人道主義和左翼作家的著作，這些作家包括羅曼·羅蘭、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和巴比塞三位。他們自二十年代起被引介至中國，對歐洲一次大戰的立場及言論也廣受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和推崇。<sup>105</sup> 葉靈鳳首先譯介巴比塞的〈他們的路〉 (*Leur Chemin*, 1914)，<sup>106</sup> 這小說跟茅盾早期的譯作同樣來自巴比塞一部在歐戰爆發之年出版，探討宿命 (la fatalité)、愛的瘋狂 (la folie d'aimer) 與憐憫 (la pitié) 等人類經驗的短篇小說集《我們的他者》。<sup>107</sup> 〈他們的路〉以寓言手法，描述村人旁觀兩位互相依存的「被犧牲者」，如何面對燒毀殆盡的立身之地；但正因為這立身之地不復存在，二人可以不用停留。他們彷彿活在他方 (ils sont ailleurs)，無視自身的不幸，由此「他們的路是廣闊的，他們隨着走下去」。<sup>108</sup> 至於葉靈鳳 (署名秋生) 選譯的法朗士〈露瑞夫人〉 (1927) 和〈死的幸福〉 (1892)，同樣採自法朗士的短篇小說集《珍珠盒》，也同樣以法國大革命為故事背景。<sup>109</sup> 〈露瑞夫人〉記述在「為正義和自由而生」 (Vivrez, pour la justice et pour la

<sup>103</sup> 巴金：〈《獄中二十年》後記〉，載《巴金譯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9卷，頁424。

<sup>104</sup> 靈鳳：〈關於《一個革命者的回憶》〉，《戈壁》第1卷第1期(1928年5月1日)，頁27–31。

<sup>105</sup> 參考錢林森：《法國作家與中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502–44。

<sup>106</sup> 巴比塞 (著)、葉靈鳳 (譯)：〈他們的路〉，《戈壁》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頁213–19；收入葉靈鳳 (譯)：《九月的玫瑰》(上海：現代書局，1928年)，頁1–8。

<sup>107</sup> 最早譯介巴比塞著作至中國的作家，茅盾是其一。1920年，茅盾從巴比塞小說集《我們的他者》的英譯本中挑選了四篇，轉譯為中文發表 (署名雁冰)：〈為母的〉 (La mère)，《東方雜誌》第17卷第12號(1920年6月25日)，頁108–13；〈名譽十字架〉 (La croix)，《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3期(1920年7月1日)，頁60–68；〈復仇〉 (Vengeance)，《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4期(1920年7月15日)，頁62–66；〈錯〉 (L'erreur)，《學藝》(1920年7月30日)，頁1–5。原著見 Henri Barbusse, *Nous autres . . .* (Paris: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Eugène Fasquelle, 1914), pp. 254–61, 311–18, 335–42, 352–59。1923年，詩人劉延陵 (1894–1988) 又據巴比塞此書英譯本轉譯了四個短篇為中文，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不吉的小月亮〉 (La petite lune méchante)，第14卷第3期(1923年3月)，頁4–8；〈十字勳章〉 (La croix)，第14卷第6期(1923年6月)，頁1–4；〈太好的一個夢〉 (Le trop beau rêve)，第14卷第7期(1923年7月)，頁1–4；〈兄弟〉 (Frère)，第14卷第11期(1923年11月)，頁1–4。原著見 Barbusse, *Nous autres . . .*, pp. 3–10, 152–58, 254–61, 295–302。

<sup>108</sup> 巴比塞 (著)、葉靈鳳 (譯)：〈他們的路〉，頁219。

<sup>109</sup> 法朗士 (著)、秋生 (譯)：〈露瑞夫人〉，《現代小說》第1卷第2期(1928年2月)，頁65–72；法朗士 (著)、秋生 (譯)：〈死的幸福〉，《戈壁》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16日)，頁229–34。原著見 Anatole France, “Madame de Luzy” et “La Mort accordée,” *L'étui de nacre*, éd. revue et corrigée par l'auteur (Paris: Calmann-Lévy, 1923), pp. 251–71。

liberté) 的訓示之下，老哲學家被低下階層激進革命派迫害的境遇；〈死的幸福〉則描寫反貴族傾向的「短褲黨」(Des Sans-culottes) 革命黨人向法官求情，甘願自我犧牲，要求與被補的情人一起上斷頭台。

相對此時期葉靈鳳選譯巴比塞和法朗士的著作，只有羅曼·羅蘭的《白利與露西》是以一次大戰為背景。它記述「於戰神的狂怒之下，在巴黎市上所發生的一幕戀愛的悲劇」。此書為羅曼·羅蘭在大戰結束、協約國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 以後發表的三部反戰作品之一，其餘兩部是戲劇《李柳麗》(Liluli, 1919) 和長篇小說《克勒莫巴爾特》(Clérambault, 1920)。《白利與露西》表面敘述戰事之下巴黎一對戀人的悲劇故事，「文字沉痛哀艷，幾乎是一首極美的抒情長詩」，內裡深刻描寫戰爭期間沒有承諾、也沒有希望的法國社會。葉靈鳳認為，小說反映了作者對正義的追求：「羅曼羅蘭是一位戰士，是正義與人道的戰士。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他目擊這種野蠻的殘殺，便站在超戰超國家的地位，發表文章痛詆這個世界的野蠻，痛責德國人及他本國政府不當的行為。戰時，他在安靜的瑞士辦理為俘虜國際通信的事業。他的目中祇有正義。凡是與正義背道而馳的，不論是那一國的人，都是他所要攻擊的仇敵。」<sup>110</sup>

誠然，葉靈鳳一再肯定羅曼·羅蘭作為「正義與人道的戰士」身分，稱許他在一次大戰之中，不會只顧本國利益而同時指責德、法兩國，維護政治上國際主義的價值。不過在戰爭現實處境之下，巴比塞針對羅曼·羅蘭拒絕直接參與政治行動的提問和質疑，似乎並未進入葉靈鳳的視野；而真正迫使他深入思考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反戰立場和政治思想，是抗日戰爭之下滬、港相繼淪陷的歷史處境。

## (二) 抗戰與「和平」的辯證：和平文藝宣傳下《火線》的翻譯

巴比塞《火線》的中文翻譯，發表在香港淪陷以前，適逢多重政治話語矛盾交疊。葉靈鳳自1938年抵港以後，繼續從事抗日文藝工作。他一方面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政治審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強權威迫，另一方面也面對當時香港文藝界「抗戰文藝」與「和平文藝」兩種勢力的對壘爭持甚至激戰。三十年代末，南京汪精衛政權推行親日的「和平運動」，宣揚和平、反共、與日本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指派香港的《南華日報》利用文藝副刊提倡「和平文藝」(又稱「和平文學」或「和平建國文藝」)的理論和創作，予以配合。<sup>111</sup> 非戰主義(pacifism)的主張，不論在一次大戰還是二次大戰，都受

<sup>110</sup> 葉靈鳳：〈羅曼羅蘭〉，載羅曼羅蘭(著)、葉靈鳳(譯)：《白利與露西》(上海：現代書局，1928年)，頁2-3。小說原著見 Romain Rolland, *Pierre et Luce* (Genève: Editions du Sablier, 1920)。

<sup>111</sup>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由林柏生代為發表致蔣介石的電報式聲明，表明他對日議和的立場，並於30日在《南華日報》刊載，中國現代史稱之為「艷電」(電報的代日韻目「艷」乃指29日)。有關汪精衛政權在香港發動「和平運動」的宣傳以至日治時期「和平文藝」的情況，

到不同軍事政權的任意宰割和詮釋。中日戰爭期間，親日派的「和平文藝」可說是「非戰主義」的變體，假借「和平」之名，宣揚反戰（以至反抗戰）之實，恣意批評主張反日的抗戰文學。<sup>112</sup>

「和平文藝」開始宣傳以前，葉靈鳳已經在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上，發表了印度詩人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回覆日本現代主義詩人野口米次郎 (1875–1947) 有關日本侵華的公開書信〈「中國不會被征服的」〉翻譯。<sup>113</sup> 此文其後在國內多份雜誌上轉載，包括編輯部從武漢遷往重慶的《內外雜誌》、江西的《政治旬刊》、福建的《公餘》，甚至在上海創辦、香港復刊的《學生雜誌》，藉以宣傳抗戰。<sup>114</sup> 兩位詩人在二次大戰前夕有關國際政治的爭議中，泰戈爾痛斥野口將日本的侵略行徑無恥地辯稱為「在亞洲大陸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無可避免的手段。事實上，野口從集團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的立場解說侵華戰事的觀點，與日後日本近衛內閣所提出建設「新東亞秩序」的論點互相呼應；<sup>115</sup> 日本近衛內閣提出的論點，更直

〔上接頁184〕

參考陳智德：〈日佔時期香港文學的兩面：和平文藝作者與戴望舒〉，《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2期（2006年），頁310–33；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135–40。

<sup>112</sup> 參考中華全國和平救國文藝作家協進會籌備處（主編）：〈和平救國文藝運動專號〉，《南華日報》，1940年5月13日。

<sup>113</sup> 野口米次郎為日本著名詩人，曾留學美國，後移居英國倫敦。三十年代到訪中國和印度，並與泰戈爾結交。1938年他兩次給泰戈爾發公開信，從愛國主義立場解釋日本的侵華行動，卻無法得到泰戈爾的認同。泰戈爾兩封回覆信函葉靈鳳均有翻譯，見泰戈爾（作）、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復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書〉（1938年9月1日），《星島日報·星座》第97期（1938年11月5日）；泰戈爾（作）、葉靈鳳（譯）：〈再答野口米次郎書〉（1938年10月），《星島日報·星座》第171期（1939年1月19日）。兩位詩人有關中日戰爭的公開書信原文見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Yonejirō Noguchi, “Poet to Poet,” *Visva-Bharati Quarterly* 4, no. 3 (November 1938), reprinted under the title “Tagore and Noguchi,” in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ed. Sisir Kumar Das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6), Vol. 3: A Miscellany, pp. 834–45。

<sup>114</sup> 泰戈爾（著）、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復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書〉，《內外雜誌》第4卷第12期及第5卷第1期合刊「戰時特刊」（1938年11月20日），頁31–32；泰戈爾（著）、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復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書〉，《政治旬刊》第68期（1938年12月11日），頁32–34；泰戈爾（著）、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公餘》復字第6期（1938年12月15日），頁36–37、40（文章最後列明轉引自《星島日報》）；泰戈爾（著）、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復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書〉，《學生雜誌》第19卷第1號（1939年1月），頁151–53（文章注明書信翻譯轉載自《星島日報》，有所刪節）。

<sup>115</sup> 中日戰爭前期，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1891–1945）發表三次外交聲明。193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聲明，近衛倡議建設「東亞新秩序」，表示「此種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見新民會首都指導部（編

〔下轉頁186〕

接影響親日派「和平運動」和「和平文藝」的宣傳。泰戈爾警告野口，若要將瘋狂屠殺平民、毀滅文化遺產的暴行視為「為亞洲拯救中國」、建立「亞洲人之亞洲」的必要條件，那只是「將施諸獸類亦屬不必的生活方式加到了人類身上」，而他「想像中的亞細亞，是要從骷髏塔上才可以實現」。<sup>116</sup>葉靈鳳藉着印度詩人的話表達自己對抗戰的決心和信念：「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她的民眾的決絕的忠誠，空前的團結，已經給這國家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突然隔在一具龐大的戰爭機械之中，中國正鎮靜的把握着她自己；暫時的失利決不會摧毀她已經振興起來的精神。」<sup>117</sup>

1940年，「和平文藝」的發展越趨熾熱，葉靈鳳遂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的機關刊物《文協》上，<sup>118</sup>發表〈再斥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一文，指責有關運動實為親日派指使下的「文化陰謀」，「歪曲抗戰事實，誣衊抗戰文藝的成就」，甚至剽竊「保障作家生活」的口號以利誘籠絡戰時文人。<sup>119</sup>葉露鳳特別指出，「和平文藝」為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理，刻意扭曲和平文學的原意，心懷不軌地宣揚反戰／反抗戰，鼓吹「暴露戰爭的殘酷」，既愚昧又不合時宜地將和平文藝粉飾為和平主義的反戰文學：

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他說今日中國文藝作品的「任務」該是暴露戰爭的殘酷，該是反戰的。這類「不聰明」的「理論」，我見了真為他們「寒心」；這不是指他們故意不提目前正在進行侵略戰爭的罪人是誰，誰使得中國民眾〔忍〕受了三年戰禍，這樣的損失該由誰來負責，而是說在他們的「太上主子」正在

〔上接頁185〕

纂)：〈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帝國政府之重大聲明〉、〈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首相之廣播演說〉(據華文大板每日轉載)，《興亞史料》第1輯(1939年7月3日)，頁13-17；近衛文磨(著)、趙如珩(譯)：〈汪兆銘氏與余——譯自十月十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新東亞》第1卷第16期(1939年10月21日)，頁2-5。第二次「近衛聲明」及同日演講的英譯見“Statemen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ovember 3, 1938” and “Radio Speech by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Prince Konoye)” (November 3, 1938), in Department of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 1, documents 329 and 330. Retrieved from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31-41v01/d329> and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31-41v01/d330> on 28 December 28 2018。

<sup>116</sup> 泰戈爾(著)、靈鳳(譯)：〈「中國不會被征服的」：復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書〉，《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1月5日。

<sup>117</sup> 同上注。

<sup>118</sup> 《文協》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的機關刊物，以副刊形式在《大公報》、《星島日報》、《珠江日報》、《申報》、《華僑日報》、《立報》、《國民日報》和《大眾日報》等報章輪流刊載。詳見陳智德：〈導言〉，載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頁64-65。

<sup>119</sup> 葉靈鳳：〈再斥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大公報·文協》，1940年4月30日。

無法支撐這失敗了的侵略戰爭，國內反戰高潮已漸漸無法遏止的當前，這樣「暴露」、「反戰」的言論一旦被他們的主子發覺之後，沒有肉的骨頭不僅不會擲到他們的跟前，他們難免還要狠狠的挨上幾腳的。<sup>120</sup>

同年，葉靈鳳在自己主編的《立報·言林》上，發表了巴比塞《火線下》部份章節的翻譯。必須指出，小說的連載基本上配合報刊的抗日宣傳策略。早於1939年葉靈鳳接任〈言林〉主編首日，即發表了〈編者啟示〉，強調副刊繼承茅盾主張抗戰文藝「這一份光榮的傳統」，<sup>121</sup>又撰文刻意提及清代吳研人的《痛史》並諷刺當下親日人士為「現代的賈似道」（通敵賣國的人物）。<sup>122</sup>《火線下》連載期間，〈言林〉從多方向致力宣傳抗日。從政治層面而言，〈言林〉堅持報導戰時消息以及各種文化情報，不僅公告附逆文人名單，<sup>123</sup>還藉先人先哲的紀念日，曲筆反諷日本侵華的情況，例如在孫中山逝世十五週年，勸告國民繼承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事業；<sup>124</sup>又在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念日，揚言「當汪記漢奸正準備『沐猴而冠』，袍笏登場的今日」，國民應「效法先烈的犧牲精神」。<sup>125</sup>當時港英殖民政府實行嚴密的政治審查，既不能直接批評日軍，又不能採用指定的政治敏感字詞，導致〈言林〉刊載的文章常被審檢刪節。<sup>126</sup>不過，〈言林〉仍發表批評汪精衛附逆以及「和平文藝」運動的言論，部份文章甚或指斥「好些民族渣滓……給他們的主子出盡了一切自作聰明的天才，進行著挑撥離間的破壞工作，大發反宣傳的漢奸謬論，計劃著種種愚民政策，播散失敗主義的氛圍」；<sup>127</sup>甚至說「汪記

<sup>120</sup> 同上注。

<sup>121</sup> 葉靈鳳：〈編者啟示〉。

<sup>122</sup> 靈鳳：〈摩登半閑堂〉，《立報·言林》，1939年1月7日。有關清末我佛山人（吳研人）《痛史》一書，葉靈鳳在香港淪陷時期再次撰文提及，見葉靈鳳：〈秋鐙夜讀抄〉，《新東亞》第1卷第3期（1942年10月），《太平》第2卷第9期復刊號（1943年9月）轉載；收入《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37-43。

<sup>123</sup> 〈言林〉刊載的文化情報，除報導文化工作者的活動以及「文協」的會議消息以外，更特別報導文人附逆的新聞，包括丁默邨、穆時英、張資平、劉吶鷗等，參考林：〈穆時英附逆〉，1940年3月10日；林豐：〈加緊檢點！〉，1940年4月5日；〈上海來信——報告漢奸文人活動情形〉，1940年5月22日。

<sup>124</sup> 參考羅布：〈發揚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楊奇：〈革命的聖地——中山在淪陷中〉，《立報·言林》，1940年3月12日。兩篇文章審查後均遭刪節。

<sup>125</sup> 楊文炎：〈黃花節〉，《立報·言林》，1940年3月29日。另參考羅布：〈遙祭——紀念七十二烈士〉、郁林：〈我們要繼續這樣的精神——紀念黃花崗烈士〉，《立報·言林》，1940年3月29日。

<sup>126</sup> 例如王叔昂〈談主和奴〉一文批評日本侵略、殖民中國，指日人嘗試建立兩國的主奴關係，以「東亞新秩序」、「日滿提携」、「和平反共建國」、「共存共榮」等說法美化其罪行。此文雖能避免「全文刪檢」，但還是遭到大幅刪節。見王叔昂：〈談主和奴〉，《立報·言林》，1940年3月22日。

<sup>127</sup> 郁林：〈我們要繼續這樣的精神——紀念黃花崗烈士〉。「民族渣滓」指汪精衛，「主子」則

之流」所上演的，不過是「傀儡戲」而已。<sup>128</sup>至於「和平文藝」更被指為「『想入非非』的『說謊』文學」，論者斥責為侵略而來的日本「筆部隊」只是將霸權曲解為正義。<sup>129</sup>

〈言林〉為了配合反日的政治言論，積極介紹文學、音樂、繪畫、電影等不同藝術領域的抗戰文藝。<sup>130</sup>文章作者不僅指出善用藝術可以爭取正義，還廣泛討論抗戰文藝的創作手法，<sup>131</sup>進而引用國內、外的例子縷述抗戰文藝的發展及其具體作用。<sup>132</sup>〈言林〉也大量刊載抗戰文藝的創作，既有表現奮勇抗戰的決心，如著名詩人艾青的〈死〉展示抗日的堅定意志：「我們也不懼死，/ 因為我們從最初有了信仰的日子，/ 就已注定自己的命運：/ 在鬥爭中生，/ 在鬥爭中死。」<sup>133</sup>又如大頓〈紅綿〉通過南國春天的紅綿花寫正直軒昂、不甘屈辱的精神，或梁錦榮〈永生〉直接寫中國軍隊與「皇軍」戰鬥，雖然為國犧牲但在狂風吼叫中仍有無數希望的呼喊；<sup>134</sup>也不乏柴米夫〈祝福〉、楊樺〈廣州灣散記〉等表達因戰亂去國懷鄉的悲傷情懷。<sup>135</sup>

為了貫徹〈言林〉在政治和文藝兩方面抗日宣傳的方針，葉靈鳳首先將《火線下》譽為「〔萬劫不朽〕的歐洲反戰文學作品」，<sup>136</sup>而報刊連載小說的最後五章翻譯（1940年2月22日至6月17日共一百零六期），正好作為反戰文學的示例，讓讀者了解「這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傑作意義所在」。<sup>137</sup>如上文所述，小說的第二十章同名章節〈火線下〉，深刻呈現了德法兩軍在帝國主義者操控之下成為受害者的相同處境。往下的第

是日軍。

<sup>128</sup> 旁觀者：〈觀傀儡戲有感〉，《立報·言林》，1940年4月10日。

<sup>129</sup> 漠清：〈筆——反攻過去〉，《立報·言林》，1940年2月26日。

<sup>130</sup> 《立報·言林》經常介紹文學、音樂、繪畫、電影等不同媒體的抗戰文藝發展，例如：考伊明的〈新型的民族英雄傳記：「衛將軍」〉（1940年2月23日）、健的〈音樂作戰在桂南〉（1940年2月24日）、豐（葉靈鳳）的〈真理報評中國畫展〉（1940年3月3日）、王健的〈做一個撒謊的英雄！〉（1940年3月13日）。

<sup>131</sup> 例子有諫如流的〈談集體創作〉（1940年3月1日）、林瑩聰的〈關於通訊的「寫實化」和「文藝化」〉（1940年3月2日）、李殊倫的〈從「包得行」說到抗戰劇作〉（1940年5月28日）、袁釗的〈我們需要大眾化的歌曲〉（1940年5月29日）。

<sup>132</sup> 例如蔡磊撰文詳述東江游擊區的抗戰文藝活動，姚雪垠更評述時人如何利用大量的期刊、報刊作為文化武器保衛安徽，粉碎日人的政治進攻和麻醉政策。〈言林〉又報導英國書業總會申述戰時閱讀如何有助維持民主思想那種種「必要的智能和理解」。見蔡磊的〈東江游擊區的文化活動〉（1940年2月22日）和〈戰時精神食糧〉（1940年3月7日），以及姚雪垠的〈大別山中的文化堡壘〉（1940年3月28日）。

<sup>133</sup> 艾青：〈死〉，《立報·言林》，1939年7月16日。

<sup>134</sup> 大頓：〈紅綿〉，《立報·言林》，1940年3月9日；梁錦榮：〈永生〉，《立報·言林》，1940年3月13日。

<sup>135</sup> 柴米夫：〈祝福〉，《立報·言林》，1940年3月11日；楊樺：〈廣州灣散記〉，《立報·言林》，1940年3月2日。〈廣州灣散記〉一文經審查被大幅刪節。

<sup>136</sup> 靈鳳：〈巴比塞的《火線下》〉。

<sup>137</sup> 葉靈鳳：〈譯者後記〉。

第二十一章〈救護所〉(Le poste de secours)，細寫救護站裡眾多傷兵無人問津的悲慘命運；第二十二章〈短途旅程〉(La virée)，則描述前線兵士短暫回到首都巴黎的遭遇。這兩章側寫戰場以外群眾對戰事的誤解和謊言，刻劃兵士在精神層面所受的巨大壓抑和創傷。最後兩章〈苦役〉(La corvée)和〈黎明〉，講述敘事者「我」與同袍重新投入戰線，走入地底挖掘戰壕，最終到達「無人之境」(La zone d'épouvante)——屍橫遍野的德法兩軍交戰前線，盡顯戰爭的殘酷景象。

葉靈鳳面對親日派「歪曲抗戰事實」、別有用心地宣傳反戰/反抗戰的「和平文藝」運動，他進一步指出巴比塞所持的是積極的反戰主義立場，為要「指示今後如何避免這慘殺的途徑」，強調他「以戰抗戰」的姿態：

「火線下」是一部反戰的作品，□□□□□□□□□□□□□□□□(案：經審查刪除十四字)，並且指示今後如何避免這慘殺的途徑。巴比塞並不是消極的，他明白的告訴他的同伴——兵士們，他們該運用另一個「戰爭」來消滅這戰爭。……在祖國艱苦的支持了反侵略戰爭兩年多，歐洲又重蹈第一次大戰覆轍的今天，巴比塞這部作品，對於我們，在歷史的認識上，在文藝的啟〔發〕上，都是值得特別向讀者推薦的。<sup>138</sup>

譯者在《火線下》翻譯連載結束之日發表的〈譯者後記〉，重申相近的觀點：

譯者在這裡發表的譯文，雖然並不是全書，而是全書的下半部。但這下半部實在是全書的精華。讀者們可以看出這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傑作意義所在。巴比塞不是一個淺薄的非戰主義者，為了人類真正的和平，正義與平等的爭取，他是主張用「另一種戰爭」來消滅這個戰爭的。在侵略戰爭的火燄瀰漫全世界的今天，這部小說實不僅是一個啟示，而是一個號召。

葉靈鳳反覆申述的是，巴比塞決意以「另一個『戰爭』」、「另一種戰爭」，徹底消滅戰爭。巴比塞的主張，處於中國抗戰的歷史語境以及「和平文藝」政治話語的夾縫之中，被解讀成為對中國人民奮戰抗日的「啟示」和「號召」。事實上，《火線下》在暴露戰爭殘酷、宣告戰爭要永絕終止的同時，小說最後一章還出現了德軍投降的一幕：

我們不時張開眼來，有幾個人在向我們走來，搖擺著。他們俯身望著我們，用一種低微的，疲乏的聲調說話。其中有一個說：

「Sie sind to[t]. Wir [b]lei[b]en hier.」

(德語：他們是死的。我們可以留在這兒了——譯者)

另一個說「Ja」(好的)，好像嘆一口氣一樣。

可是他們發現我們在動著，於是立刻就跪倒在我們的面前。〔那人用不帶口音

<sup>138</sup> 靈鳳：〈巴比塞的《火線下》〉。

的) 法文向我們說,「我們投降」,他們動都不動。然後他們全體屈服了,好像鬆了一口氣,這正是他們苦難的終結一般;其中有一個臉上塗滿爛泥像是野蠻人的刺花一般,甚至微微的笑了。<sup>139</sup>

小說以德軍兵士用法文道出「我們投降」(Nous levons les bras) 作為這場戰爭苦難的終結,隱隱留下了民族主義者寄望戰爭勝利的聲音——縱使這結局並不全然代表小說的主導思想。基於上文的分析,我們嘗試歸納若干重點:其一,中日戰爭期間《火線》複雜的反戰思想未能獲得充分的闡釋,當時論者不斷宣揚抗戰文藝的政治力量,葉靈鳳又一再強調巴比塞「以戰抗戰」的姿態,小說於是被詮釋為中國抗戰的「號召」,巴比塞對戰爭的思考便無可避免地被簡化甚至扭曲。其二,港英殖民政府宣告政治中立並對報章實施嚴格的審查,葉靈鳳雖沒有明言巴比塞主張的「另一種戰爭」其實乃指國際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從主編〈言林〉開始便率先譯介蘇聯共產主義作家拍夫朗訶的《紅翼東飛》,高舉國際主義、「超越國界」的反戰立場;<sup>140</sup>又在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持續發表有關戰爭的翻譯和評論:〈一位戰地聯絡官的手冊〉(Carnet d'un officier de liaison) 闡述二次大戰中必須戰鬥的原因;<sup>141</sup>〈兩個短篇〉描寫烏克蘭農民受外來統治者及地主階級雙重壓迫的苦況,比附中國「西北作家筆下的兩篇日後方的農村故事」;<sup>142</sup>美國共產主義作家兼政治活動家德萊塞(Theodore

<sup>139</sup>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火線下〉(八十八),《立報·言林》,1940年5月29日;Barbusse, *Le Feu*, p. 416。譯文中的德語句子拼寫有誤,又「沒有口音的」(à la voix sans accent) 一句誤譯為「聲調單調的」,皆據原著修訂。

<sup>140</sup> 《紅翼東飛》的單行本正於《火線下》翻譯連載期間出版,見彼得·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紅翼東飛》(重慶:大時代書局,1940年)。小說以一次大戰以後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為背景(1918-1922),描述紅軍反抗日本軍閥入侵海參崴的戰事。衛國戰爭的主題、鮮明的反日情緒,固然切合當時中國抗戰的現實處境,但其中特別講述蘇、中、韓以至日本反軍國主義的民眾合作建設以日本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片山潛(1859-1933)命名的和平之城,又想像中國民眾加入蘇軍抵抗遠東侵略者的戰事,從而表現國際主義、「超越國界」的反戰立場,並肯定抗日戰爭裡中國民眾的勇武和捨身精神。《紅翼東飛》思想複雜,其中文翻譯必需重置於中日戰爭的歷史脈絡加以探討,本文作者曾以〈抗日戰爭語境與西方文學資源——論葉靈鳳主編《立報·言林》及《紅翼東飛》的翻譯〉為題,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跨』與『轉』:現當代華語文學文化的遺產、變革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年11月1-2日)上討論相關論點。

<sup>141</sup> 親赴戰場的法國小說家夏姆遜(André Chamson, 1900-1973)表示:「因為世界已經達到了一種糜爛狀態,我們所熟悉愛好的生活已經有被掃除的危險。我們在戰爭,我們更在進行一種比戰爭更大的工作。我們正處在人類生存的變形期中。有一些東西必須要保衛。站起來保衛的祇有兵士們。」見A·夏姆遜(著)、葉靈鳳(譯):〈一位戰地聯絡官的手冊〉,《星島日報·星座》第625、626期(1940年6月23、24日)。

<sup>142</sup> 瓦西爾·斯特伐尼克(著)、靈鳳(譯):〈兩個短篇〉(〈一個孩子的照顧〉、〈新聞〉),《星島日報·星座》第586期(1940年5月13日)。

Dreiser, 1871–1945) 面對歐美文明即將因戰事而毀滅的質疑，述說了「黎明在東方」所帶來的鼓舞。<sup>143</sup> 葉氏對左翼思想及政治立場的基本認同，由此可見一斑。其三，《火線》的解讀方向從「反戰」到「抗戰」的轉移變化，具體展示了無產階級革命中堅持「以戰抗戰」的主張，因着抗日戰爭的歷史語境，與民族主義主戰的傾向重合。<sup>144</sup>

#### 四、結語

1941年的「黑色聖誕」(12月25日)，香港淪陷。日本軍事佔領期間，葉靈鳳完全停止了文學翻譯的工作。然而，他再次借助紀念羅曼·羅蘭的文章，迂迴地論述自歐洲一次大戰至當時二次大戰的情況，表明了抗戰的決心。1943年10月30日，葉靈鳳在日本人支持下他所主編的《大眾週報》上，發表〈悼羅曼羅蘭〉一文，宣告羅曼·羅蘭於10月18日巴黎逝世的消息。<sup>145</sup> 葉靈鳳重申「羅曼羅蘭自始至終還是一位戰士：人生的戰士，正義的戰士」，指出法國的「愛國分子」要待戰爭狂熱散退以後方能認識羅曼·羅蘭的反戰立場以及主張「超越戰爭」(Au-dessus de la mêlée)的洞見。<sup>146</sup> 作者最後說明，從反戰議題進入戰爭語境下，知識分子對藝術人生的思考：

為了自由，為了解放，為了歷史的新頁的開始，戰爭向世界需索着最鉅的代價。文藝不是懦怯漢，更不是逃避者，他當然也要擔負他份內應付的一份。「生活於今日罷。無論對於那一天，你都應該真誠。愛牠，敬牠，不要褻瀆牠，而且不要妨礙那開花的時候的來到。」

<sup>143</sup> 葉靈鳳以為「這個回答，使東方一大民族的我們聽了，對於目前我們所從事的戰爭，真是一面感到光榮，一面感到所負責任的重大」。見T·德萊塞(作)、葉靈鳳(譯)：〈黎明在東方〉，《星島日報·星座》第710期(1940年9月18日)。

<sup>144</sup> 〈言林〉連載翻譯小說《火線下》前，曾刊載無產階級革命家及理論家張天聞(1900–1976)新著《論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的一致》的評介，文中指汪精衛另組政府、聲稱「防共反共」都是日人破壞中國團結作戰的技倆，並引書中所言：「過去的歷史，已經無數的證明：正是站在階級立〔場〕上的工人階級真正能夠為了『大我』，而犧牲『小我』，能夠為了全人類，全民族的利益而犧牲一切。」見施展：〈新書介紹：「論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的一致」〉，《立報·言林》，1939年11月21日；洛浦(張天聞)：《論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的一致》(重慶：新華日報館，1939年)。

<sup>145</sup> 靈鳳：〈悼羅曼羅蘭〉，《大眾週報》第2卷第5號31期(1943年10月30日)；收入《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61–63。此文於《華僑日報·文藝週刊》第49期(1945年1月7日)重刊，略有修訂。

<sup>146</sup> 靈鳳：〈悼羅曼羅蘭〉，頁61–62。引文提及的文章〈超越戰爭之上〉，乃1914年歐洲戰爭爆發，羅曼·羅蘭在《日內瓦日報》發表的著名反戰文章。見Romain Rolland, “Au-dessus de la mêlée,” *Journal de Genève*, Le 24 septembre, 1914。

這是羅曼羅蘭寫在《悲多汶傳》裏的他的英雄主義的真髓。抓住生活，一刻也不要放鬆；忍受命運的鞭笞，但是切不要為命運所戰敗。這是羅曼羅蘭所給與我們的囑咐。<sup>147</sup>

葉靈鳳嘗試從羅曼·羅蘭的著作中尋求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繼續生活的精神支持，結果找到了羅曼·羅蘭早年撰寫的著名傳記《貝多芬傳》。這書闡述了英雄主義的真髓：縱然「忍受命運的鞭笞，但是切不要為命運所戰敗」。正如抗戰時期傅雷藉着重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鼓勵國人奮勇抵抗外敵：「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sup>148</sup>為了自由、解放、歷史的新發展，「戰爭向世界需索着最鉅的代價」，文藝自有其應負的責任。葉靈鳳在戰火蔓延之際悼念羅曼·羅蘭，強調他筆下的英雄主義，最後移花接木，將論點轉化為中國人民面對戰事的鼓勵。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港英殖民政府的政治審查、香港文藝界抗戰文藝與親日的「和平文藝」兩種勢力的爭持，從事文學翻譯及評論遂成為多重政治壓迫之下抗戰文藝「內在抵抗」的重要策略，亦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窗戶，得以檢視戰爭語境下知識分子的複雜思考。

<sup>147</sup> 靈鳳：〈悼羅曼羅蘭〉，頁62-63。引文提及《悲多汶傳》，今譯《貝多芬傳》。參考 Romain Rolland, *Vie de Beethoven*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03)。

<sup>148</sup> 傅雷：〈譯者序〉（1942年3月），載傅雷（譯）：《貝多芬傳》，收入《傅雷譯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卷，頁7。傅雷早於1932年譯畢《貝多芬傳》，但並未出版；至1942年在中日戰爭時期「全部重譯」，於1946年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

# 跨越歐亞戰爭語境的左翼國際主義： 論巴比塞《火線》及葉靈鳳的中文翻譯

(提要)

鄭可怡

歐洲一次大戰爆發，年過四十的巴比塞自願參軍，並自視為「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對參軍的信念堅定不移，但論思想和行動複雜縝密，他遠過同代的左翼知識分子，因而令人難以理解。一方面，他堅決反對國際間由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所引起的戰爭，但拒絕高舉「義戰」的旗幟支持法國兵士參戰。另一方面，他堅決「反戰」，卻沒有加入和平主義者的行列，甚至親赴戰場主張以「另一種戰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消滅戰爭。是以他憑藉自身經驗撰寫的小說《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遂成為探討作家本人以至戰時歐洲知識分子各種意識型態的重要中介。

《火線》所牽涉的複雜戰爭思考，隨着中文翻譯的出版，跨越一戰和二戰的時間維度、歐亞文化及戰爭語境，進入中日抗戰的歷史脈絡。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葉靈鳳(1905–1975)避戰南下，翌年抵達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並在自己主編的《立報》副刊〈言林〉連載巴比塞《火線》部份章節的翻譯。他以為當時「旁的書僅是描寫戰爭的型態，『火線下』卻寫了『戰爭』本身」，小說「指示今後如何避免這慘殺的途徑」。本文從跨越歐亞戰爭語境的角度，重新審視《火線》及葉靈鳳的中文翻譯，並探討以下問題：第一，巴比塞的《火線》作為一次大戰的戰爭文學有何特點？它如何在帝國主義及和平主義的雙重否定之中發展其獨特的革命思路？第二，在跨越歐亞戰爭語境之下，巴比塞和葉靈鳳在各自的時代有關戰爭、國際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思考有何不同？面對着怎樣不同的衝擊？第三，抗戰時期香港殖民政府嚴苛的政治審查下，文人如何通過文學翻譯爭取最後的言論空間？葉靈鳳又如何重新詮釋《火線》以回應當時的政治環境？

**關鍵詞：** 國際主義 無產階級革命 中日戰爭 巴比塞《火線》 葉靈鳳  
香港《立報·言林》

# The Left-wing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and Asian Wars: Barbusse's *Le Feu*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e Lingfeng

(Abstract)

Connie Ho-yee Kwong

Henri Barbusse (1873–1935), a self-proclaimed “anti-military socialist,” decided to join the army at over forty years of age when the First World War broke out. Although his faith in taking part in the war remained strong, his thought and behaviour appeared so complicate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leftist intellectuals that one found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him. He opposed all international wars caused by the militarism and the imperialism, and yet he would not support the French army which entered the war to fight in the name of justice. He claimed to be an anti-war campaigner, but he refused to join the pacifists. He even went to the battlefield and advocated for an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stop all wars. His novel, *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 (Under fire: The story of a squad), published in 1916 and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in the battlefield, becomes a medium for us to study the ideologies of the author and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the wartime period.

If Barbusse's reflections on war is not loaded enough for *Le Feu*, the arrival of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certainly added weight to it. Along with the translation are elements of bot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both the European and the Asian culture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translator of the novel, Ye Lingfeng 葉靈鳳 (1905–1975), came to Hong Kong a year after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leaving Shanghai that had fallen to the Japanese force in 1937. He publish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five chapters of the novel in 1940 in *Yin Lin* 言林, a literary supplement of the newspaper *Lih Po* 立報 for which he served as the editor. He emphasized that *Le Feu* is a novel that reveals the nature of a war, instead of describing the features of a war, and it is also a novel that demonstrates how to avoid such a kind of massacre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look at Barbusse's *Le Feu*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a transcultural and trans-historical perspective. Firstly, it examin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Le Feu* as anti-war literature and studies how Barbusse developed his own revolutionary ideas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he imperialism and the pacifism. Secondly, it studies Barbusse's and Ye Lingfeng's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on war,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m in Europe and Asia during the wartime. Last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Hong Kong intellectuals tried to seek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by mean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under the severe political censorship impos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how Ye Lingfeng represented and reinterpreted *Le Feu* in response to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time.

**Keywords:** internationalism    proletarian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War  
Henri Barbusse's *Le Feu*    Ye Lingfeng  
literary supplement *Yin Lin* of the newspaper *Lih Pao* (Hong Kong)